

生育铸币论（一）

从明清三百年白银铸币税流失到与美元霸权的货币制度竞争

（“国家经济学”系列研究首篇：历史理论）

何泽寿

修订时间：2026-7-20 作者主页：<https://orcid.org/0009-0008-9660-2669>

摘要

全球经济陷入债务高企、生育衰退和冲突频发的现代文明困境，根源在于美元霸权主导的全球秩序。本文提出“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核心命题，穿透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迷障，发现美元霸权深深地根植在中华民族近代三百年悲惨苦难史中：16—19世纪，欧洲金融资本以“白银贸易”为伪装，利用殖民美洲获得的近乎零成本白银，通过先走私、后公开的方式，持续三百年大规模套取中国丝绸、瓷器和黄金等核心商品，其实质是发行白银货币，窃取中国铸币税，本质是“超级假币入侵”；这一外部冲击摧毁了中国自奴隶社会以来的“王权货币垄断制度”，逐步掏空了中国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本，导致明清两代“穷得只剩下白银”，走向国运衰竭；欧洲金融资本凭借中国铸币税完成原始积累，并在剥削技术升级中建立起“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又在一战和二战前期躲避战祸而将主体迁至美国，逐步升级为美元霸权，持续掠夺全球铸币税。为打破这一延续五百年的掠夺秩序，阻止历史悲剧重演，本文提出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即生育劳动铸造货币，与美元霸权展开货币制度竞争。此项改革不仅能补齐消费短板、恢复正常生育率和摆脱美元剥削，更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制度根基，并引领人类文明新方向，逐步瓦解美元霸权。

关键词：铸币论；货币垄断制度；美元霸权；生育铸币制度；国家经济学

前言：“国家经济学”系列研究说明

2025年我国新生儿已锐减至792万人。若不改革，按人口学家梁建章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到2050年新生儿将跌破500万人，到2100年或将跌破100万人。显然，这将动摇发展根基，走到“人口亡国”的危险境地。

本研究旨在建立“国家经济学”理论体系，揭示人口危机的根源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并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取而代之。本研究总称《铸币论》，由《生育铸币论》《国家经济学宣言》和《理论纲领》三部分组成，覆盖历史理论、货币理论、

改革方案、制度批判、战略理论、循环理论、国家理论、文明史观等十余个研究专题（详见作者主页）。研究发现：

一、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

货币不是银行的负债凭证，而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用于商品交换；劳动力商品来自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因此，货币与劳动力是生育劳动成果的一体两面，即货币=劳动力，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这表明，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铸造了货币；货币的本质是劳动力，主权属于人民。然而自古以来，货币主权被少数群体垄断，导致家庭部门付出生育劳动，却没有货币收入，缺钱消费。这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剥削机制，是一切经济困境的总根源，严重时引起社会动荡与战乱。

二、核心病灶：货币垄断制度剥夺人民的货币主权

美元霸权推动并主导了全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各国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把货币造出来占为己有，剥夺人民的货币主权，拿去买入外汇、黄金和放贷，即通过资产购买和信贷扩张的方式发行货币，把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铸币税）圈入银行后院，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这是占有了生育劳动成果，不劳而获。其中，外汇储备的实质是铸币税大量流向美国，并支撑起美元霸权。这表明，出口顺差越多，财富流失就越严重，而家庭部门则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三、根本矛盾：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

经济越发展，银行部门发行的货币就越多，占有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规模就越庞大，即经济增长成果（铸币税）被银行通过垄断造钱的方式攫取，而非转化为家庭部门的民生福祉。这是对家庭生育劳动的系统性剥削，造成社会分配严重失衡，使人民负债严重、消费力不足和利益受损，产生“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的根本矛盾，导致国家经济陷入债务高企、需求不足、就业困难、社会内卷和生育衰退的系统性困境。

四、严重后果：社会动荡与战乱

长期以来，无数妈妈缺钱消费，是因为钱被银行部门垄断了：它们把钱造出来购买外汇、黄金和放贷。前者劳而不获，后者不劳而获。这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生长在国家经济体上的“巨型肿瘤”，它附骨吸髓，使广大人民“骨瘦如柴”，酿成新生儿锐减的根本性人口危机。因此，这一制度反人类，是国家经济困难的根源。长此下去，将把国家推向“人口亡国”的危险境地，引起社会动荡与战乱，不排除上演历史轮回。

五、理论遮蔽：西方主流经济学构筑“认知囚笼”

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于16-19世纪欧洲殖民扩张和长期窃取“中国白银铸币税”的历史进程。它将货币曲解为银行的负债凭证，并主张货币中性论，是西方金融统治阶级精心筛选、资助、固化和推广的理论工具，旨在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美元霸权

提供理论遮蔽，维护其剥削利益。这一遮蔽为人类社会构筑了“认知囚笼”，使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长期无法进入政策和公众视野，导致人们把其严重后果误认为是个人失败、自然规律或市场失灵，失去了反抗意志。

六、唯一出路：建立生育铸币制度，把货币主权还给人民

唯有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即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用于生育补助，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让“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使货币主权回归广大人民，我们才能解除人口危机、走出经济困境和摆脱美元剥削，避免重蹈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覆辙，也避免一百年后重演历史周期律悲剧。

本文是“国家经济学”系列研究首篇，从历史出发，论证“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核心命题。

本文目录

第一章 引言

一、研究背景

（一）美元霸权主导全球秩序并掠夺铸币税，是现代文明困境的制度根源

（二）世界经济史的四大经典谜题与理论空白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揭露中国“三百年白银铸币税失窃”的历史真相和剖析美元霸权根底

（二）剖析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史学对中国“白银铸币税失窃”的遮蔽与扭曲

（三）回应四大经典谜题，突破西方中心论

（四）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与美元霸权展开货币制度竞争

三、主要研究成果

四、研究定位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和生育铸币的基础理论构建

一、人的再生产

二、生育劳动

三、劳动力商品

四、人力资本

五、铸币税

六、真币与假币

七、王权货币垄断制度

八、白银货币垄断制度

九、银行货币垄断制度

- 十、货币分配失衡
- 十一、生育铸币制度
- 十二、货币主权

第三章 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现有研究的共同不足与本文的突破口

第四章 欧洲金融资本窃取中国“白银铸币税”导致明清两代国运衰竭

- 一、中国白银主币化：从货币萌芽到走私进口，再到主币确立
- 二、货币主权沦丧：欧洲金融资本在中国构建“白银货币垄断制度”
- 三、**超级假币入侵**：白银货币垄断制度的掠夺本质
- 四、大国失血：中国铸币税流失转化为欧洲金融资本积累和工业革命
- 五、人力资本枯竭：持续三百年铸币税流失的毁灭性冲击
- 六、国运衰竭：白银货币垄断制度下的明清王朝更替和晚清列强入侵
- 七、从王朝周期律观察：欧洲金融资本摧毁了明清王朝更替的内生修复机制
 - （一）古代中欧的货币制度对比分析框架
 - （二）中国古代“**王朝周期律理论模型**”
 - （三）欧洲金融资本摧毁了明清王朝更替的内生修复机制
- 八、核心症结：明清国运衰竭的根源不是发展问题，而是铸币税失窃问题
- 九、本质界定：中国明清两代沦为欧洲金融资本的“**货币殖民地**”

第五章 欧洲金融资本的剥削技术升级：银行货币垄断制度

- 一、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确立：从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的范式跨越
- 二、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全球推广：从欧洲本土到其殖民地的制度性掠夺
- 三、剥削机制：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与白银货币垄断制度一脉相承
- 四、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核心矛盾**是货币分配失衡，导致经济循环梗阻
- 五、理论遮蔽：西方主流经济学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披上“合法外衣”

第六章 美元霸权的历史渊源、剥削机制与制度基础

- 一、欧洲金融资本控制了美国，然后塑造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
- 二、跨洋大迁徙：欧洲金融资本将“家底”搬运到美国，升级为美元霸权
- 三、美元霸权：将古老的剥削逻辑推向全球
- 四、剥削机制：美元霸权与白银货币垄断制度一脉相承
- 五、优势加持：人口发展优势与军事霸权的反向支持

六、人类铁枷锁：美元霸权的七大优势和各国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锁死效应

七、美元霸权悖论：美国人民也是受害者

第七章 用“铸币税流失导致人力资本枯竭”回应经典学术议题

一、破解李约瑟之谜：人力资本枯竭让工业革命失去核心根基

二、解释近代大分流：人力资本的此消彼长造成中西方发展分野

三、回应全球经济中心转移之谜：人力资本转移带动经济中心转移

四、阐释非西方世界现代化困境：人力资本衰竭成为核心桎梏

五、核心论断与统一答案：人力资本是国家第一资本

第八章 瓦解美元霸权的第一步：破除对黄金的迷思及改革方案

一、黄金的重要性是西方金融统治阶级编造的谎言

二、从事实与逻辑上对黄金重要性的双重证伪

三、黄金迷思导致的双重危害

四、改革方案：建立“储备黄金交易市场”，让黄金成为投资品而非货币锚

第九章 用“生育铸币制度”与美元霸权展开货币制度竞争

一、生育铸币制度的总体构想

二、生育铸币制度的可行性验证和终极目标

三、生育铸币制度的主要收益

四、我国具有率先建立生育铸币制度的独特优势

五、用生育铸币制度瓦解美元霸权的核心逻辑

六、用生育铸币制度开启“生育文明”新纪元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一、理论发现：被遮蔽的经济学真理

（一）劳动者是一切财富的创造主体，劳动力商品是现实世界的核心价值

（二）生育劳动是经济循环的真正起点，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价值，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本源和根基

（三）铸币税以货币发行者占有的各类商品或金融资产为形式表现，是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是家庭部门生育劳动的最终成果

二、历史真相：被遮蔽和扭曲的中华民族悲惨苦难史

（一）中国持续三百年“白银铸币税失窃”，导致明清两代国运衰竭

（二）欧洲金融资本用“白银超级假币”入侵中国完成原始积累，推动了工业革命，并且建立起银行货币垄断制度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欧洲金融资本掠夺中国白银铸币税的行为，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遮蔽

（四）美元霸权继承了欧洲金融资本的衣钵，深深地根植在中华民族近代三百年苦难史中

三、历史规律：被掩盖的文明兴衰法则

（一）货币垄断制度导致“货币分配失衡”，是中国古代王朝周期律的根源

（二）中西方发展分野的根本原因在于铸币税失窃导致人力资本此消彼长

四、制度创新：用货币发行制度改革照亮文明新路

（一）用“生育铸币制度”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二）中美竞争的核心与本质，是货币制度的终极较量

（三）瓦解美元霸权的第一战：以“人本位”取代“金本位”和“美元本位”

（四）用生育铸币制度瓦解美元霸权，引领人类文明新方向

五、历史总纲（核心结论）：货币制度决定文明兴衰

六、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正文

第一章 引言

本文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将其拓展至生育劳动领域，提出“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价值本源）”核心命题，并弘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重构历史经济理论，从根本上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桎梏，旨在以史为鉴，回应现实问题，也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探索新的理论路径。

一、研究背景

（一）美元霸权主导全球秩序并掠夺铸币税，是现代文明困境的制度根源

当今世界已陷入看似矛盾的系统性困境：一方面，各国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通过购买外汇、黄金和信贷扩张（放贷）的方式发行货币，向社会注入大量货币，导致货币泛滥；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政府和家庭部门债务高企、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销售、就业和婚育困难，引起社会内卷，导致主要经济体的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

以韩国为例，1990—2025 年的 M2 货币增长超过 20 倍，而新生儿数量却从 68 万人下降到 25 万人/年，不足维持人口正常更替所需数量的二分之一，被媒体形容为

即将“人口亡国”。类似问题在日本、德国、意大利等普遍存在，我国也同样面临这一严峻挑战。

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是生育衰退的核心表征，代表了生育意愿、生育能力及实际生育水平持续性、趋势性下降，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具体表现为新生儿数量持续减少，无法维持人口代际平衡。它将导致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持续减少，引起养老负担过重、消费需求不足、市场根基萎缩、创新活力枯竭和财政税基衰减，使经济难以持续发展；也容易招来外部势力的觊觎和挤压，引起社会动荡和战乱，产生文明存续风险。

全球除了债务高企与生育衰退之外，还伴随冲突频发。归根结底，这一现代文明困境的核心症结在于美元霸权主导全球秩序，并掠夺铸币税。

本文所称的“**美元霸权**”，在主体层面，指美国金融统治阶级，即以美联储、华尔街核心金融机构为组织载体的金融资本统治集团；在制度层面，指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始，美国金融统治阶级推动和主导全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架构，使美元成为全球核心储备货币、结算货币与定价货币，进而通过印刷美元换取全球商品，再凭借美元发行权带来的资本数量绝对优势“坐庄”，操纵全球金融市场，反复夺回美元，用于二次换取全球商品（详见第六章），以追求金融资本无限增殖为目标，以“掠夺各国铸币税”为实质的不对称权力格局。

在美元霸权主导下，各国银行部门以买入美元为本币发行的主要锚定，长期承受美元跨境掠夺，导致铸币税流失、内部分配扭曲、民生投入被挤压。**其实质是中心国家占有铸币税（发行美元），外围国家出卖劳动力（换取外汇）。**这是一项长期性的人为货币垄断制度安排。而全球性的债务高企与生育衰退，正是这一垄断制度的运行结果和一体两面，形成“货币越来越多、孩子越来越少”的悖论格局。

美元霸权通过掠夺全球铸币税，从财力上支撑起美军霸权，维持远超其国力的军事开支与霸权行动；然后美军霸权反过来巩固美元霸权。此外，美国在部分州实行了禁止堕胎的人口政策；它是移民国家，可以不断通过移民填补生育缺口。这些措施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长期性的畸形竞争优势。凭借这一优势，美国在国际社会推行单边主义与强权政治，频频发动战争，挑起贸易与地缘冲突，任意干涉他国内政。例如，在 2003 年 3 月攻打伊拉克，之后抓走并绞杀其总统；2011 年 3 月武力介入利比亚，致其总统被俘身亡；2026 年 1 月越境抓捕委内瑞拉总统；2026 年 3 月空袭伊朗，炸死其最高领导人。此外，**美国还在美元霸权的财力支撑下，频繁军事介入中国南海，联合国举行军事演习，意图破坏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阻断中国经济发展。**这一系列行动既是对各国发出的严重威胁，也是对人类追求和平与发展努力的公然践踏。其实质是**美国金融统治阶级利用世界人民创造的财富去攻打它想要攻打的国家，以此巩固美元霸权。**

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2025年美国挑起全球贸易战，以提高关税为手段胁迫其他国家加入对中国的贸易围堵。这是搞经济霸权。2026年2月9日，美国众议院以395票赞成、2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所谓的“台湾保护法案”，公然以“将中国排除于国际金融体系之外”相威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这既是搞政治霸权，也是美元霸权锋利獠牙的公开路演。

长期以来，美国在国际社会推行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仰仗的是美军霸权，核心依靠的是美元霸权。因此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主义的内核，也是全球秩序的核心主导者。他们在长期掠夺实践中已建立起“七大霸权优势”（详见第六章），其掠夺各国铸币税的本性和强大畸形能力，不仅对我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更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根本性破坏，已成为套在人类身上的铁枷锁。若任由这一霸权发展下去，各国经济基础被逐步掏空，必将引起全球性的剧烈社会动荡，不排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系统性崩溃重演。因此，如何瓦解美元霸权，已成为时不我待的历史性命题。

（二）世界经济史的四大经典谜题与理论空白

汉唐至宋元，中国依托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领先世界的手工业技术与成熟的货币体系，长期居于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成为世界财富与技术的集聚中心。然而在明清两代，中国经济逐步衰落，从世界经济巅峰跌落至积贫积弱的谷底，最终沦为西方列强宰割的对象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启了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借助殖民扩张与跨洋贸易完成原始资本积累，顺利开启工业革命，逐步建立起全球经济与金融主导权；二战后美国金融崛起，通过不断技术升级形成今日的美元霸权。

这一历史变迁催生了四大长期悬而未决的经典学术谜题：其一，“李约瑟之谜”（李约瑟，1954），即为何中国古代科技与经济长期领先世界，却未能在近代自发催生科技与工业革命；其二，“近代大分流”（彭慕兰，2000），即18—19世纪，中西方为何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转型上出现根本性分野，也即欧洲为何能在数百年间从文明边缘地带一跃成为主导近代世界的核心力量；其三，“全球经济中心转移之谜”（多学者提出），即全球经济中心为何从古代的中国（唐宋）转向近代的欧洲，又进一步转向现代的美国；其四，“非西方世界现代化困境”（多学者提出），即近代以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非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何普遍陷入困境。

这四大谜题看似领域不同、时空各异，实则指向了同一个追问：**为何曾经长期领先的中华文明会落后于西方？**学界对此虽多有探讨，却始终未能形成具有说服力的统一答案。这正是本文试图回应的理论空白，也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必要的探索空间。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揭露中国“三百年白银铸币税失窃”的历史真相和剖析美元霸权根底

长期以来，美元霸权主导全球秩序，以此掠夺各国铸币税，已成为现代文明困境的核心乱源。要瓦解这一霸权，须得从历史中去追根求源，刨出美元霸权的根底，才能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本文研究发现，美元霸权并非孤立的现代金融现象，而是欧洲金融统治阶级历经数百年剥削技术不断升级的结果，其源头可追溯至明清时期欧洲金融资本对中国构建的隐秘“**白银货币垄断制度**”（详见第四、五、六章）。

本文所称的“**欧洲金融资本**”，是指15—20世纪伴随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萌芽而崛起的“欧洲金融统治阶级”的统称。它以欧洲传统私营金匠铺、借贷行等高利贷资本为原始基底；以意大利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私营金融资本为早期核心；以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等王权特许的私营海外殖民组织为发展主体；以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私营英格兰银行（1946年国有化）等近代新式银行为升级载体。

欧洲金融资本依托殖民掠夺、鸦片走私、货币发行与管控、信贷创造、高利贷、证券交易等核心手段，以占有铸币税和钱生钱为核心目标，全力追求金融资本无限增殖。其中，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它有权组建军队、签订条约、建立殖民地，是金融资本与殖民暴力的复合体，也是利用白银和鸦片工具长期掠夺中国铸币税的核心主体之一。

16—19世纪，欧洲金融资本以“白银贸易”为伪装，利用从美洲殖民掠夺的近乎零成本白银，通过先走私、后公开的方式，持续三百年大规模套取中国丝绸、漆器、瓷器、黄金等核心社会经济产出。实际上，这不是贸易，而是面向中国“**发行白银货币**”，充当了中国的“中央银行”，掠夺中国铸币税（优质商品），本质是“**超级假币入侵**”。整个过程具有主观故意和长期预谋，其目标明确、意志坚定，是充分利用了中国社会在经济理论上的认知局限。因此，这一掠夺行为应当定性为“**窃取**”。

中国自奴隶社会起就建立了“**王权货币垄断制度**”，到明代初期已经运行数千年。在这一制度下，王权通过货币发行获得铸币税，主要用于王室、军事、官俸等开销，也用于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和城市建设等民生发展，是国家财政的核心支柱。明代初期，这一货币体系以大明宝钞（纸币）为主、铜钱为辅，官府明定交易禁用金银。本文第四章论证提出，该制度存在“剥削家庭部门生育劳动价值本源，导致货币分配失衡”的根本缺陷，使社会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进而引起销售、就业和婚育困难的系统性经济困境，导致了王朝周期性衰落；但它把铸币税用于财政开销和社会发展，与高利贷隔离，不以资本增殖为目标，可以搞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实际蕴含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核心思想，因此造就了汉唐、宋元的经济鼎盛。这与古代欧洲“个人

本位”思想主导下，铸币权分散、与高利贷合二为一、追求资本无限增殖的“私有货币制度”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这一根本性差异，使中国经济得以在古代长期遥遥领先于欧洲。

然而自 16 世纪的明代中期开始，欧洲金融资本开展所谓的“白银贸易”，起先是以走私的方式突破中国官方禁银令，再逐步推动白银成为中国主货币，垄断中国货币发行权，摧毁了中国的“王权货币垄断制度”。在这一长达三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欧洲金融资本长期窃取中国铸币税，不断获得超额利润，再兑换为黄金，逐步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同时也奠定了欧洲工业革命的物质基础。此外，他们还在剥削技术升级中逐步建立起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

中国明清两代在这一外部冲击下，持续三百年掉入“出口优质商品（铸币税）→收取白银货币符号”的巨大陷阱，最后“**穷得只剩下白银**”——这些白银流入中国后，大量进入极少数官僚、买办和高利贷资本手里被窖藏；官府丧失了货币发行权和庞大的铸币税收入，为了维持政权运转，不得不对民间展开竭泽而渔的重税盘剥，使明清两代陷入“越征越穷、越穷越征”的恶性循环，导致官府、军队和民众长期陷入赤贫困境：官员欠薪、军队缺饷，民间卖儿鬻女是常态，饿殍千里屡见不鲜；更造成生育和教育双重塌陷。这一塌陷表现为人均寿命极低（生得多、能成年的少）和普遍是文盲，导致青壮劳动力和科技、经济、管理、军事人才严重短缺。其实质是国家的“人力资本枯竭”。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金融资本的主体为躲避战祸，携带黄金、剥削技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相关人才迁移至美国，与更早前到达的欧洲金融资本汇合，经过剥削技术再升级，形成了如今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基础的美元霸权。

美元霸权的基础，不在于美国自身有多强大，而在于各国银行部门以美元为锚定，通过买入美元发行本币和形成外汇储备，使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现在，美元霸权几乎垄断了各国银行的底层货币供给，其核心运行逻辑与明清两代的白银货币垄断制度一脉相承，均以垄断货币发行权为核心手段、以窃取各国铸币税为核心目标（详见第六章）。正是这一霸权行为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债务高企、生育衰退等系统性经济困境，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最大桎梏。

以上发现还原了世界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明清两代因铸币税长期流失导致人力资本枯竭而失去发展根基，走向国运衰竭；欧洲金融资本利用“**白银超级假币**”掠夺中国铸币税完成了原始积累和推动工业革命；美国金融统治阶级因全方位继承了欧洲金融资本衣钵而成为新霸权，改通过发行“**美元超级假币**”，掠夺全球铸币税。同时也揭露了一个根本问题：欧洲金融资本长期殖民美洲挖取白银用于窃取中国财富，使中国经济从世界巅峰跌落到谷底，沦为欧洲的“**货币殖民地**”，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受害者。

在揭露以上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本文将深入构建中国古代“**王朝周期律的理论模型**”，并系统剖析欧洲金融资本与美元霸权的运转规律和剥削机制，在此基础上得出“货币制度决定文明兴衰”核心结论。这是本文的关键理论突破，将有助于重构人类文明演进史，也为瓦解美元霸权和破解现代文明困境提供逻辑起点。

（二）剖析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史学对中国“白银铸币税失窃”的遮蔽与扭曲

欧洲金融资本持续三百年窃取中国铸币税，在主流叙事中仅以“自由贸易”“白银贸易”为名载入史册，草草了事。这是因为那段历史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史学刻意遮蔽了。也正是这一遮蔽，造成前述世界经济史的四大经典谜题长期无法真正破解。

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指发轫于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以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为理论源头，融合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主要理论流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统称。该理论体系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理论前提，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目标，以“货币中性论”“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为核心理论假设，刻意掩盖了货币发行掠夺铸币税的核心事实，在实践中造成了“金融资本无限增殖、民生需求让渡”的结果。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铸币税”的定义，仅仅局限于“货币发行者通过发行货币而获得的收入”，从不关心铸币税的表现形式、价值来源、价值本源和应归谁所有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理论体系的**遮蔽**下，人们根本无法看到中国“三百年铸币税失窃”的严重问题，反而将其**扭曲**为欧洲金融资本的“正当”贸易所得。唯有跳出该理论体系，我们才能看清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实际经历了长期铸币税失窃的悲惨苦难史。

西方主流经济学起源于欧洲殖民扩张和长期窃取中国铸币税的历史背景下，它从来就不是一门中立的科学，而是欧洲金融资本通过精心筛选、资助、固化和不断推广，以服务于殖民统治和金融掠夺的理论工具（详见第五章）。想想看，他们既然能在殖民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那么资助、打造对其有利的经济理论，以此构建理论遮蔽和话语霸权，如此简单的事情就更不可能不做。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真实来历。如今这一体系已成为美元霸权的理论根基，为美元充当“世界货币”、实施跨境铸币税掠夺提供系统性的理论遮蔽。

此外，“西方中心论”史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同出一源，共同服务于西方金融统治阶级的利益，将欧洲金融资本窃取“中国铸币税”的掠夺本质，粉饰为“自由贸易”与“白银贸易”，使中华民族三百年铸币税失窃的苦难史在“商品交换”的伪装下被刻意遮蔽。

本文通过历史分析与逻辑推演相结合的方式，在传统“铸币税=面值-铸币成本”理论基础上，重构“**铸币税**”核心范畴（详见第二章），揭示铸币税实际表现为货币发行者用货币换得的商品、服务和债权等具象财富，例如欧洲金融资本通过发行白银

货币而占有的中国丝绸、瓷器、黄金等就是铸币税本身；这些铸币税实际是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价值来源），是家庭部门生育劳动的最终成果（价值本源），理应归属于育儿家庭所有（货币主权），实现“按生育劳动分配”的价值闭环（生育劳动铸造货币）。

这一理论发现揭示了一个**根本问题**：欧洲金融资本窃取中国白银铸币税，他们不需要付出实质性劳动，只通过造钱就赚得盆满钵满，成为剥削者，使中国家庭部门因生育劳动白白付出，而长期在苦难中挣扎，沦为受害者。

西方主流经济学忽视货币主权这一根本前提，回避铸币税的本质追问，无视家庭生育劳动的艰辛付出。这不是局部遗漏，而是其服务于西方金融统治阶级的立场导致的根本性底层逻辑缺陷。也正是这一缺陷导致其无法面对债务高企、生育衰退的现代文明困境提出任何有效解决方案。

人类社会是由无数家庭组成的；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创造了新一代的劳动力（孩子），进而间接创造了铸币税，却得不到铸币税。这一生育劳动的计价缺失，构成了传统经济学的根本性“原罪”。本文构建的中国古代“王朝周期律理论模型”将揭示，这一缺失恰恰隐藏了“**把生育劳动沦为无价值活动**”的人类社会这一“根本性剥削机制”，使经济活动反复陷入周期性困境。

本文第六章将深入揭露，美元霸权传承了欧洲金融资本数百年的金融掠夺衣钵，不断研究剥削技术的“**核心算法**”，对外宣称为金融工具、金融技术和金融创新，其核心是以美元货币发行权带来的资本数量绝对优势“**坐庄**”，构建起“国际资本流动、黄金交易、虚拟货币交易”等赌场，终极目标是通过操纵全球金融市场获利，用来窃取各国铸币税；并且铸币税的形式早已不再局限于普通商品，还广泛延伸到了被掠夺国的股权、债权等金融资本领域。这是美元霸权对其他国家的长期性掠夺工具、掠夺机制和强大畸形能力，是对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威胁。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支撑起那些剥削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顺序实施的神主牌。

本文重构铸币税理论，既弥补了生育劳动的计价缺失，也为全文论证奠定了逻辑原点。从这一起点出发，展开经济学的科学革命，以此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桎梏，我们就能避免再次遭到西方长期铸币税剥削、导致“穷得只剩下白银”的历史悲剧重演。

（三）回应四大经典谜题，突破西方中心论

本文通过铸币税理论创新，发现中国明清两代国运衰竭的根本问题是：“铸币税失窃→生育教育塌陷→人力资本枯竭”。其中“人力资本”的此消彼长，为以上“李约瑟之谜”等四大经典学术谜题提供了统一、自洽的全新答案：欧洲金融资本和美元霸权通过长期窃取非西方世界的铸币税来滋养生育和教育，获得人力资本，形成西方领先的发展优势；而以中国明清时期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因长期“**流失铸币税**”而使

生育和教育垮塌，导致人力资本枯竭，失去了发展根基。以上答案打破了西方中心论对全球经济史的垄断解释，可推动经济学研究向非西方视角回归（详见第七章）。

基于以上重大发现，本文第九章提出，非西方世界建立自主可控的“**生育铸币制度**”，即以生育补助的唯一方式，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将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用于支持家庭部门的生育活动，以此不断提升人力资本和补齐消费短板，就能摆脱对美元的依附，突破发展困境，逐步赶超西方世界。生育铸币制度的实质，是生育劳动铸造货币，本质是用“**人本位**”取代“**金本位**”和“**美元本位**”。这是本文提出的重大原创性制度构想。

（四）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与美元霸权展开货币制度竞争

欧洲金融资本窃取“中国白银铸币税”导致明清两代国运衰竭的历史悲剧警示我们：（1）货币发行制度是国家资源配置、财富分配的核心底层架构，也是大国博弈的根本主战场；（2）目前中美竞争的表层博弈体现在贸易、科技、地缘政治等多维领域，但究其核心与本质，是货币制度的终极较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西方主流经济范式的影响下，建立起了欧洲金融资本原创的传统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现在，这一制度既是各国通行的货币发行制度框架，也是美元霸权的土壤。它通过银行部门买入外汇、黄金和信贷扩张的方式发行货币，把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圈入银行后院，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分配失衡与资源错配的严峻问题。例如截至2025年末，我国央行持有3.3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2025年贸易顺差高达1.19万亿美元；然而，自2017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2025年新生儿数量已下降至792万人。这一人口结构失衡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难题。类似问题在日本、韩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在矛盾的背后，实质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铸币税”收益分配与人口发展脱节，反映出这一制度存在根本缺陷。这也表明，从16世纪至今五百年，全球经济始终笼罩在西方金融统治阶级掠夺铸币税的旧秩序之下，从未改变。

本文第六章论证提出，美元霸权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根基，已发展出了“七大霸权优势”，因此我们继续停留在该制度框架内，实际很难与美元霸权展开公平竞争，亟须制度创新。

为此，本文提出建立自主可控的“生育铸币制度”，以此跳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框架，与美元霸权展开差异化的“**货币制度竞争**”，建立新秩序。本文第九章经论证提出，生育铸币制度不仅能补齐消费短板、恢复正常生育率和摆脱美元剥削，更能为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制度支撑。并且，这不仅是中国自身的制度革新，更能成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核心旗帜，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公平、普惠、共生的方向变革。这一变革将引领人类文明新方向，逐步瓦解

美元霸权，使其军事霸权失去财力支持，从而推动全球经济走出困境，实现人类和平与发展。

人类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霸权的终结，从来不是被武力打倒的，而是被更好的制度淘汰的。美元霸权的终结，未必是某天突然崩盘，而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推行生育铸币制度后，逐渐自行缓慢瓦解。这是文明之战，不是热战。

三、主要研究成果

本文继承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性、共同富裕、人的解放”等理论内核，经过系统研究，将呈现以下主要研究成果：

1. 重构“铸币税”核心范畴（核心理论创新，第二章）。
2. 揭露中国“三百年白银铸币税失窃”的重大历史真相（历史发现，第四章）。
3. 剖析“欧洲金融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剥削机制”（历史发现，第四、五章）。
4. 构建“古代中欧货币制度对比分析框架”（揭示历史规律，第四章）。
5. 构建“中国古代王朝周期律的理论模型”（揭示历史规律，第四章）。
6. 剖析“美元霸权的根底和剥削机制”（历史发现，第六章）。
7. 回应世界经济史的四大经典学术谜题（提交统一答案，第七章）。
8. 提出“人力资本是国家第一资本”（核心论断，第七章）。
9. 破除对黄金的迷思和改革方案（认知突破，第八章）。
10. 提出“生育铸币制度”改革方案（制度创新，第九章）。

四、研究定位

本文是《生育铸币论》和“国家经济学”系列研究的开篇，以中国明清三百年白银铸币税流失为历史铁证，提出和论证“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核心命题，完成“货币历史溯源—铸币税理论奠基—生育铸币制度构想”三项核心任务，形成“生育劳动铸造货币”的理论起点，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这一理论体系总称“铸币论”，旨在从根本上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桎梏。

本研究遵循了杨瑞龙（2026）提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六步方法论框架：“把握既有理论→识别特征性事实→凝练科学问题→提炼标识性范畴→引申命题→形成系统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货币与人口领域的中国化、时代化探索。根据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理论，本研究并非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内进行修补，而是发起一场新的“范式革命”（Paradigm Shift）。新、旧范式在基本假定、核心命题、价值标准和解题方式上均存在根本性断裂，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恳请读者和专家暂时悬置传统评判标准，转而以新的视角审视本研究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是否真正具备范式

革命的潜力。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和生育铸币的基础理论构建

为了准确分析历史和表达理论主张，现对本文的关键名词进行界定，并构建生育劳动铸造货币的基础理论。

一、人的再生产

是指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所进行的人口再生产，以及建立在这一生物基础之上的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的再生产，还包括传承科学技术，改善审美、道德、法律等精神和制度规范，推动文明进步的再生产。

二、生育劳动

是指孩子成长为具备社会劳动能力的个体之前，家庭部门的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在怀孕、分娩、抚养、教育、住房等各方面的所有直接和间接人力投入。其中直接人力投入包括直接用在孩子身上的陪伴、照料时间和精力投入；间接人力投入包括赚钱养家、为孩子提供物质保障的劳动投入，以及向国家缴税、用于国家建设学校和聘请教师的投入。在现代社会，家庭对孩子的生育劳动投入往往需要持续 20 年左右的时间。生育劳动的经济产出是向社会提供新的“劳动力商品”。

家庭生育劳动培育了孩子的“源生智能”，这是新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核心。所谓源生智能，是指自然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其中前者是智力，后者是技能。例如，父母教育孩子认路、学习文化和社会规范，这是认识世界、培养智力；父母教育孩子如何吃饭、穿衣，这是改造世界、培养技能。

源生智能的核心是生命。生命具有强烈的欲望和无穷的想象力，二者合并起来就是强大的发明、创造和革新能力。这是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源动力，是生育劳动的社会价值和核心意义。

三、劳动力商品

是指劳动者以其体力、智力和技能为基础，生产物质文化商品和提供人力服务的能力。其中，体力是肉身的外在表现，可创造的社会价值很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用两个例子来证明：一是人去世后肉身只能火化成灰；二是严重智障的人虽然有充沛的体力，但无法投入社会生产创造任何价值。劳动力商品的主体价值来自劳动者的智力与技能，即在学习与实践继承和发扬科学技术所形成的社会生产能力。

劳动者去世后，其掌握的科学技术会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成为文明进步的阶梯，因此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凝结在科学技术之中，不会消失；人类社会的所有科学技

术都是劳动者创造的，是历史上所有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结晶；科学技术并不真正独立存在，那些图纸、公式、论文、机器等等必须由活生生的劳动者去理解、掌握、改进和应用，需要由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来不断地继承和发扬，否则就会失传。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来自两方面：一是来自父母原生家庭的生育劳动投入，形成以生命为基础的源生智能，产生发明、创造和革新能力（发扬科学技术）；二是通过自主学习、实践掌握的科技能力（继承前人科学技术）。

每个人的劳动力商品都具有基本可数的量化属性和天然有限的稀缺性，例如平均每天工作 8 小时，一年工作 250 天，一生工作 40 余年；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将随劳动者个体的年龄增长而自然折损，能在社会再生产中转化为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也能在生育劳动中转化为下一代的新劳动力商品。

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劳动者，就没有社会生产。人类社会的所有财富归根结底都是劳动者创造的，都是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并且这些财富几乎都有经济寿命周期、都需要劳动者去重新创造才能复现。因此，劳动力商品是现实世界的**核心价值**。

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创造了下一代劳动者，而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创造了劳动力商品的源生智能。没有生育劳动，世界将会一片荒芜；没有人的再生产，就没有经济活动的主体。因此，人类社会的经济循环是：“生育劳动→人口繁衍→劳动力商品→生产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实现金融资本无限增殖或反哺生育劳动”。这表明，生育劳动是经济循环的真正起点，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价值**，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本源和根基。

四、人力资本

是指一国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总和；具体表现为国家人口在“数量水平”与“质量水平”双重维度上的综合积累。其中数量水平以生育率、夭折率和人均寿命等为衡量标准；质量水平以教育水平、技能水平和代际传承能力为衡量标准。人力资本是国家发展的根基；人力资本带来的人口繁衍、消费需求、科技创新、生产力提升是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

五、铸币税

货币在形式上由“**货币载体**”和“**货币内核**”两部分组成。货币载体指货币的外在形式，其作用是识别、防伪和辅助流通，它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变：一是贝壳、金属等实物货币；二是纸钞、存款货币、数字货币等信用货币。货币内核指货币面值与其制造成本之间的差额，是货币的内在价值核心，也是货币的主体。货币发行者正是利用货币内核占有铸币税。**本文所研究的货币，指货币内核。**

传统理论认为，铸币税是指货币发行者通过发行货币而赚取的超额利润，实际指

向的就是货币内核。从古至今，铸币税始终存在并且本质未变。例如，白银货币的交换价值远远高于其采矿成本；纸币的成本更低，例如一张 100 元纸币制造成本可能只有 1 元，其铸币税高达 99 元；而存款货币的制造成本趋近于零，因此其价值几乎全是铸币税。用公式表达为：

$$\text{铸币税} = \text{货币面值} - \text{铸币成本} \quad (\text{传统计算公式})$$

本文在以上传统铸币税理论基础上，提出以下理论发现：

（一）铸币税的表现形式

货币发行者把货币制造出来交给劳动者的同时，换得其生产成果或债权，是实现了铸币税的占有。因此，铸币税并非以货币本身为表现载体，而是以占有物质生产成果、服务生产成果以及债权等对价形式呈现。其中，对生产成果的占有属于一次性获益，即通过单次货币交换，直接获得劳动者创造的具象财富；对债权的占有则属于一次性占有，分期性获益，即通过持有债权，分期获得孳息收益。以下根据货币来源不同，划分为三类场景：

1. 王权铸造货币

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铸造铜钱（金属货币）和印刷大明宝钞（纸币），垄断货币发行，用于支付官员俸禄和采购军粮物资，用公式表达为：

$$\text{铸币税} = \text{官员服务、军粮物资} \quad (\text{表现形式})$$

2. 美洲白银货币

在中国明清两代，欧洲金融资本利用殖民美洲获得的近乎零成本白银（在美洲生产货币），换得中国高价值丝绸、瓷器、漆器、黄金等优质商品（在中国发行货币），用公式表达为：

$$\text{铸币税} = \text{丝绸、瓷器、漆器、黄金} \quad (\text{表现形式})$$

3. 银行信用货币

在现代，各国银行部门通过买入外汇、黄金、股票、放贷等方式发行货币，得到外汇储备、黄金储备、银行持股、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用公式表达为：

$$\text{铸币税} = \text{外汇储备、黄金储备、银行持股、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 \quad (\text{表现形式})$$

（二）铸币税的价值来源

由于一切财富归根结底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所以铸币税实际分别是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和价值体现。用公式表达为：

$$\text{铸币税} = \text{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 \quad (\text{价值来源/直接来源})$$

（三）铸币税的价值本源

由于劳动者来自家庭长达 20 年左右的生育培养，所以铸币税的本质，是家庭部门生育劳动价值的最终成果。用公式表达为：

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价值本源/根本来源）

（四）生育劳动铸造货币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和民生主体，是最原始的合伙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再生产。其内在运转逻辑可概括为：“发展经济→养儿育女→老有所养→人生幸福”。这表明，生育劳动并非单纯的家庭事务，而是内嵌于经济系统、支撑社会存续的核心经济活动，也是民生领域的主体经济活动；而人们通常所称的“民生艰难”，核心指向的就是生不起、养不起的生育困难，例如在中国明清两代普遍性地存在卖儿鬻女。因此，铸币税理应归属于育儿家庭，用于补偿生育劳动，支撑人的再生产，满足家庭生育消费需求，实现“按生育劳动分配”的价值闭环，形成生育劳动铸造货币的“生育铸币制度”。

六、真币与假币

传统理论仅从货币发行主体、材质成色与外观形制区分货币真伪，遮蔽了货币的核心本质。本文基于铸币税归属这一底层逻辑，对真币与假币做出本质界定：

真币，是指由国家授权发行，铸币税归属于本国，用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合法货币；假币，是指未经国家授权、私自铸造或境外输入，以攫取铸币税为目标的非法货币。真币与假币可能在物理形态上有所区别，用肉眼或验钞机可以识别；也可能完全相同。例如：古代中国官方制造的铜钱和纸币是真货币，而私人制造的铜钱和纸币就是假货币；中国明清两代官方自产白银为真货币，而从境外输入的美洲白银就是假货币。

中国古代历朝对私铸铜钱、伪造纸币均处以死刑、连坐等重刑；新中国成立以后，查获制造假人民币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国家始终予以严厉打击。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阻止铸币税被非法窃取。这一贯穿古今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铸币税归属是货币的本质属性，任何以非法手段攫取铸币税的行为，无论伪装得多么巧妙，都是对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的直接侵害。

七、王权货币垄断制度

是指中国自奴隶社会开始，君主、帝王领导的官方垄断货币发行权制度。中国古代的货币有金属货币和纸币两大类。典型的金属货币有铜钱和黄金；典型的纸币有宋代的交子、会子和明代初期的大明宝钞。王权通过垄断货币发行权获得铸币税，主要用于王室、军事、官俸等财政开销，也用于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和城市建设等民生发

展。这一制度既存在剥削家庭部门生育劳动价值本源的根本缺陷，也蕴含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核心思想。

八、白银货币垄断制度

是指 16—19 世纪欧洲金融资本凭借殖民美洲获得的近乎零成本白银，通过先走私、后公开的方式，大规模套取中国丝绸、瓷器、漆器和黄金等核心商品，推动白银成为中国主货币，垄断中国货币发行权，持续三百年窃取中国铸币税的隐蔽剥削制度。晚清时期，西方列强通过鸦片走私与战争索赔方式从中国公开抢劫白银，再用来套取中国核心商品，窃取“第二轮铸币税”，是该制度的延伸与升级。

九、银行货币垄断制度

是指 1609 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时起，欧洲金融资本不断进行剥削技术升级，逐步实现由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通过银行买入外汇、黄金、股票和信贷扩张的方式发行货币，将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铸币税）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银行持股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的货币发行制度。这一制度从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时起，在美元霸权主导下逐步推广至全球，其基本特征是各国以买入美元外汇作为本币发行的主要锚定和储备资产，由此形成了由美元霸权主导的全球货币垄断体系，是美元霸权的制度根基。

十、货币分配失衡

指从古至今，货币在发行环节绕开了家庭部门生育劳动价值本源，直接大量流入少数人手里，无法形成社会有效消费需求的货币垄断制度根本缺陷。这一缺陷导致了以下两方面后果：

（一）货币集中

货币在垄断发行过程中，主要流入土地、房产、金融市场、出口部门、虚拟经济等资本密集型领域，并通过贪污截留、高薪俸禄、利润分配等多种途径直接大量流入极少数人手中，再转化为高利贷或市场投机等金融资本。由此形成了天然梗阻的经济循环链条：“生育劳动→人口繁衍→劳动力商品→生产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科技进步→垄断铸币→货币集中→金融资本无限增殖”，其中，生育劳动被沦为无价值活动，成为金融资本无限增殖的工具。

（二）供需断裂

货币发行绕开家庭部门生育劳动价值本源，必然导致社会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引起销售、就业和婚育困难。具体表现为“供需断裂”：一方面在需求端，家庭部门普遍需要生育消费，却没有钱（需求不足和生育困难）；另一方面在供给端，很多人想卖商品、想找工作，但是因家庭部门消费不起，只能滞销和失业（销售和就业困难）。

这种供需断裂的实质是没有货币来做交换媒介，使供给与需求双方长期分裂性地存在，连接不上。

以上货币分配失衡理论，可用来解释传统经济理论中的以下概念：贫富两极分化、通货紧缩、阶级固化（货币集中的表现）；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社会内卷、经济循环梗阻（供需断裂的表现）；财政危机（供需断裂导致的税基萎缩）；中等收入陷阱（供需断裂导致的发展瓶颈）；经济危机（供需断裂的极限爆发）；人口老龄化、生育衰退、人口亡国（终极后果）。

十一、生育铸币制度

这是本文提出的原创性货币制度构想，是指国家采用生育补助的唯一方式发行增量货币，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将铸币税收益直接反哺给育儿家庭、持续培育人力资本的新型货币发行制度。

生育铸币制度将修复和打通经济循环，核心链条是：“生育劳动（发行货币）→人口繁衍（消费需求）→劳动力商品（充分就业）→生产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产销两旺）→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反哺生育劳动（幸福生活）”。

这一货币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继承了中国古代王权货币垄断制度的“天下为公”大同社会核心思想，又弥补了“家庭部门生育劳动无补偿”的历史制度缺陷，将从根本上打破货币分配失衡，有效提升民生福祉，防止外部的铸币税掠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成真正的发达国家，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十二、货币主权

是指货币的发行权和收益权，以及建立在这两项核心权利基础之上的货币管辖权。其中，货币发行权包括如何发行货币，什么时候发行，发行多少；收益权指铸币税归谁所有；管辖权包括制定货币政策、监管金融体系、决定外汇管理、反对外部干预等权力。

我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货币主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组成部分，自然也应当归属于人民。国家作为人民意志的执行人，通过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保障人民行使货币主权，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制度实现。在这一创新制度下，货币发行权和收益权将实际回归家庭部门；银行部门将回归货币中介、资金融通、服务人民的本职功能。

第三章 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一）明清白银货币化研究

国内学界对明清白银货币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多维度的研究成果。全汉昇在《明清经济史研究》（2011）中系统梳理了白银从民间自发使用到官方法定本位的演进脉络，明确指出明代“一条鞭法”对白银主币地位确立的推动作用，揭示了中国白银供给依赖海外贸易的历史成因。万明（2004）进一步从全球贸易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中欧商船贸易等白银入华路径，指出16至19世纪中国在全球白银贸易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吸纳了全球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刘志伟（2009）则聚焦白银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分析了白银货币化如何重塑明清赋役制度，指出白银成为财政核心后，国家对货币供给的掌控能力反而弱化。

在明清国运衰竭的归因研究中，传统观点多聚焦于政治僵化、闭关锁国、封建制度腐朽等层面。樊树志在《晚明大变局》（2015）中虽从多维度分析晚明衰亡，但仍未触及货币主权的核心问题。部分学者从货币金融角度切入，如刘志伟（2009）指出白银外流引发的“银荒”是晚明财政崩溃的重要原因；全汉昇（2011）也论及晚清白银外流加剧了经济衰退。这些研究初步触及了货币主权与国家发展的关联，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均未深入揭示欧洲金融资本通过白银供给垄断窃取中国铸币税的深层机制，更未将铸币税三百年外流与明清国运衰竭建立起直接、系统的因果关联。

（二）美元霸权与当代货币体系研究

在现代货币体系与美元霸权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多围绕美元霸权的形成机制、运行特征与全球影响展开分析。向松祚在《美元霸权》（2007）中系统梳理了美元霸权的历史形成与制度支撑，指出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石油美元绑定机制，以及美国对IMF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权，是美元霸权实现全球掠夺的核心支柱。王信（2022）进一步分析了美元霸权的演变趋势，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将危机成本转嫁全球，近年来又通过掌控SWIFT支付体系强化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垄断。张明（2021）则从全球美元循环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利弊，提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完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应对思路。

这些研究为本文理解美元霸权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扎实基础，但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多停留在现象分析与应对策略层面，缺乏从历史逻辑传承角度将明清白银货币垄断与现代美元霸权进行整体性分析；二是未能触及美元霸权的核心本质——延续自欧洲金融资本的铸币税掠夺逻辑，更未提出能够从根源上瓦解美元霸权的原创性制度方案。

（三）生育衰退与经济发展关联研究

针对国内生育衰退与经济发展的关联研究，学界多从人口结构、生育政策、民生保障等角度提出对策。蔡昉（2004）从人口红利视角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生育率下降将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储蓄率下降，进而制约长期增长潜力。王丰、蔡泳（2020）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指出生育成本高企、社

会保障不足是生育意愿低迷的主要原因，提出完善托育服务、减轻教育负担等政策建议。

这些研究为本文理解生育衰退的现实表现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均未从货币制度底层逻辑出发，探讨货币发行与生育劳动价值补偿的内在关联。鲜有研究注意到：铸币税的持续流失，恰恰是家庭生育成本无法得到社会补偿的制度根源。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一）西方中心论视野下的明清中国研究

国外学界对明清中国的研究，长期以“西方中心论”为传统主导视角。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1954）中提出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时，虽惊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却将未能自发催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归结为封建制度束缚、重农抑商政策等内部因素。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2000）中虽试图挑战传统西方中心论，将18世纪末中西发展分野部分归因于煤炭资源分布与殖民地地理的偶然性，但其分析框架仍以欧洲为参照系，未能揭示欧洲崛起的真实根源——对中国铸币税的系统性掠夺。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2001）中虽以量化数据呈现了中西经济的长期变迁，但仍将西方崛起归因于制度优势与技术革新，忽视了殖民掠夺与跨国金融剥削的决定性影响。

在全球白银贸易研究中，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1998）中突破性地指出，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是16至18世纪全球贸易的核心特征，中国处于全球经济的中心地位。但弗兰克虽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却将之解读为“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推动了全球贸易发展”，刻意回避了欧洲利用近乎零成本美洲白银套取中国高价值商品的铸币税掠夺本质。

（二）现代货币体系与美元霸权研究

在现代货币体系研究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理论前提，为美元霸权的全球运行提供了理论支撑。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提出“银行印钞能增加生产和收入”理论。这一理论被后世奉为圭臬。但是，该理论实际是把银行部门的“金融资本扩张”误认为是实体经济层面的资本积累与社会收入增加。

弗里德曼与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1963）中系统阐述了货币中性论，其核心命题是：货币供给的变化仅影响物价水平，不影响实际经济变量。这一理论掩盖了货币发行权垄断对社会分配的根本性影响。特里芬在《黄金与美元危机》（1960）中揭示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矛盾（“特里芬难题”），但未能触及美元霸权的掠夺本质。

（三）生育衰退研究

在生育衰退研究方面，西方学者多从人口老龄化、生育观念转变、社会福利体系

等角度分析成因。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1798）中提出的人口论虽影响深远，但其分析框架已不适应当代现实。当代西方人口研究，如欧洲多国的人口老龄化报告、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系列报告，多聚焦于政策应对层面，同样未将生育衰退与货币制度对生育劳动价值的忽视建立起理论关联。

三、现有研究的共同不足与本文的突破口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现有成果虽在各自领域形成了有价值的结论，但仍存在三个层面的共同不足，恰好构成本文的研究切入点：

第一，研究视角的割裂性。现有研究将明清货币史与现代货币体系研究相互割裂：明清货币史研究者聚焦于白银货币化的历史进程，未将其与现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联系起来；美元霸权研究者多从当代国际金融格局出发，未能发现其掠夺铸币税的历史逻辑传承。本文第四、五、六章将系统揭示，白银货币垄断、银行货币垄断和美元霸权是同一剥削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

第二，理论分析的表层性。现有研究对货币垄断与金融剥削的分析多停留在现象描述，未从铸币税本质与资本运行逻辑出发，构建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无论是国内学者对白银外流的分析，还是西方学者对美元霸权的批判，均未能揭示铸币税的本质与生育劳动的内在关联。本文第四章将从理论层面构建“货币垄断→生育困难→文明衰退”的系统性分析框架，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桎梏。

第三，对策研究的局限性。针对美元霸权与生育衰退的应对策略，多为表层的政策调整：人民币国际化、完善国际金融治理、生育补贴政策等，均未触及货币发行权这一核心问题。鲜有研究意识到，**破解生育衰退与瓦解美元霸权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关键在于重构货币发行制度，使铸币税收益反哺生育劳动。本文第九章将提出“生育铸币制度”这一原创性方案，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上述不足表明，从铸币税掠夺视角出发，贯通明清货币史与现代货币体系、揭示货币垄断制度与人的再生产的深层关联、构建新型货币制度解决方案，正是当前研究的学术空白，也是本文的突破口。

第四章 欧洲金融资本窃取中国“白银铸币税”导致明清两代国运衰竭

1644 年清军入关以少胜多，导致明朝灭亡；从 1840 年鸦片战争时起，晚清遭受西方列强入侵，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 1912 年灭亡。这两项国运衰竭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主流叙事认为，这是封建统治的系统性崩塌，包括政治腐败、财政崩溃、农民起义、改革滞后、列强入侵、民心尽失和革命终结，却恰恰遗漏了明清两代遭受持续三百年“白银铸币税失窃”的根本原因。

白银是导致明清两代“铸币税失窃”的核心工具。它并非天然的货币，但它却偏

偏成为明清两代的主货币：白银在中国的货币体系中经历了从民间零星使用、官方禁用，到明代中期欧洲金融资本利用美洲殖民白银走私入境、突破禁令、逐步扩大使用范围，再到明清两代官方被动确立法定主币的漫长演进。自从白银开始走私入境后，中国因本土白银资源禀赋先天不足，形成对美洲白银的长期刚性依赖，导致中国铸币税长期流失，最终落得国运衰落的悲剧下场。这一历史进程是尘封已久和鲜为人知的中华民族悲惨苦难史。重新揭开这段历史，不仅可以看到货币主权对国家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也能看清美元霸权的前身在欧洲的发展根底和剥削本质，更能看清楚，任何货币垄断制度都将必然导致民生凋敝、文明衰退的历史规律。

一、中国白银主币化：从货币萌芽到走私进口，再到主币确立

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化萌芽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历经汉唐宋的缓慢发展，在明清两代正式确立主币地位。这一主币化进程为欧洲金融资本长期垄断中国货币发行权、窃取中国铸币税创造了制度前提。

（一）白银货币的萌芽：战国至唐宋的缓慢发展

中国拥有数千年的主权货币史。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的夏朝就已有黄金、白银、赤铜三种金属货币；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结合现代考古研究表明，西周王朝通过垄断铜锡资源，造制和发行青铜货币。货币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而官员和军队的出现，是典型的社会分工；王权必须垄断铸币，然后用货币来支付官员薪俸和发放军饷。由此推论，中国自最早的奴隶社会夏朝开始，就已经建立起了中央控制的“王权货币垄断制度”。

战国时期，白银首次以银贝、银布币等形态出现在历史记载中，但彼时的白银仅为贵族阶层的财富贮藏器物，并未进入民间流通领域，不具备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基本货币职能，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秦至西汉前期，国家确立了以黄金、铜钱为核心的法定货币体系，并且《史记·平准书》中明确记载此时期“货币只有黄金和铜钱”，白银被明确排除在货币体系之外。

汉武帝时期曾尝试推行“白金三品”，以白银为主要原料铸造货币，但因币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遭到社会普遍抵制，推行不久便被废除；新莽时期的“银货二品”同样试图将白银纳入法定货币体系，却因违背经济规律、缺乏社会基础未能成功，无实物留存于世。这两次尝试的失败，反映出白银在当时尚未具备成为主流货币的社会基础。

东汉后期是白银货币化的关键转折点，湖南常德出土的东汉银饼，成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真正意义上的白银货币，标志着白银正式从单纯的财富象征向货币形态转变，开始用于小额交易与赋税缴纳。但此时期的白银货币仍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与职能局限性，仅在江南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流通，民间日常交易仍以铜钱为主。

唐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大额支付需求的提升，白银的货币职能进一步强化，船形、板状的银锭开始大量出现，广泛用于税收、贡赋、军费等官方大宗交易领域。但受限于白银总量不足，其流通范围仍局限于上层社会、官府与商人之间，未能深入民间日常交易，铜钱仍是民间流通的核心货币。

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成为白银货币化的重要铺垫。彼时铜料短缺导致铜钱供给不足，王权为弥补财政赤字，启用交子、会子等大额纸币；但因货币滥发和假币泛滥，引发多次恶性通货膨胀；民间为规避货币风险，自发选择白银作为价值贮藏与跨区域结算的核心工具。随着漕运、盐税、军费等大宗交易的频繁开展，白银成为民间跨区域结算的通用货币，标准化的银锭形制逐步形成，官方与民间对白银的使用需求持续提升。但宋代并未赋予白银法定货币地位，其流通完全依赖市场自发选择，这一特质也为后续白银货币依赖海外供给埋下了关键隐患。

（二）明代确立白银主币地位：从官方禁用、走私进口到官方被动认可

明代是中国白银货币化的关键历史阶段，历经“官方禁银—民间自发—美洲殖民白银走私入境—官方被动认可—法定本位”的完整演进。这一主币化过程，始终以美洲白银的持续走私流入为物质基础，形成了对美洲白银的深度依赖。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中央集权、牢牢掌控货币发行权，确立以铜钱为辅、大明宝钞为主的货币体系，明确规定“交易用钞，禁用金银”，对使用白银交易的行为予以严厉惩处。其实质是新王朝建立起了以宝钞为核心的“王权货币垄断制度”。但是，宝钞滥发和假币泛滥是根本性难题。这导致宝钞迅速贬值——洪武年间发行的宝钞，至永乐年间已贬值九成以上，宣德年间更是形同废纸，恶性通货膨胀使民间对官方货币体系彻底失去信任。

在宝钞崩溃、铜钱因铜料短缺难以满足流通需求量的背景下，民间为维持商品交易的正常开展，自发突破“禁银令”，重新选择白银作为交易媒介，形成“官方禁银与民间自发用银”的长期博弈局面。明正统元年（1436年），官府建立“金花银”赋税制度，规定江南地区的田赋可以折银缴纳，使白银获得官方局部、有限认可。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海上新航路的开辟推动了全球“白银贸易”的兴起，欧洲殖民者将美洲开采的大量白银持续走私流入中国，弥补了中国本土白银资源的匮乏。在这一背景下，官方被迫逐步放松银禁，从“禁银”转向“认银”。至隆庆元年（1567年），官府正式颁布“银钱兼使”法令，从法律层面确立了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使白银与铜钱成为国家法定的流通货币。

明万历九年（1581年），内阁首辅张居正在清理丈量全国土地的基础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将全国的田赋、徭役、杂税等所有赋役全部折银征收。这一法令的推行，使白银从单纯的流通货币转变为国家财政的基础，成为连接国家财政与民间经济的核心纽带：从国家层面看，财政收入、军费开支、官员俸禄均以白银

为核算单位，白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从民间层面看，百姓为缴纳赋税必须将农产品、手工业品转化为白银，使白银成为民间经济活动的必备货币，商品交易、工资支付、财富贮藏均以白银为主。当然，尽管这个法令颁布了，但实际执行仍然有一个逐步推进的长期过程。“一条鞭法”的推行，标志着明代官府彻底放弃了王权货币垄断制度，正式确立白银主币地位。从此，中国货币体系进入全新的白银本位时代。

明代的白银主币化进程，从本质上说是美洲白银走私输入的产物。美洲白银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流入中国：16—18 世纪以西班牙主导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为核心，超过 1/3 的美洲白银经菲律宾马尼拉流入中国东南沿海；18 世纪后欧洲“商船贸易”取代前者成为主导，占白银入华总量的 70% 以上。反观中国本土，白银年开采量长期徘徊在 10 万两左右，根本无法满足主币化后的货币需求，使美洲白银成为货币发行的主体。这一先天缺陷，使中国白银货币体系从建立之初，就陷入“持续依赖美洲白银供给”的致命陷阱——货币发行权不再由中国主导，而是被掌握到了欧洲金融资本手中。

（三）清代白银主币制度的延续：货币体系固化与进口依赖

清军入关取代明朝后，并未颠覆前代已成型的货币与赋役体系，而是在继承万历年间“一条鞭法”赋役折银核心原则的基础上，从三个维度进一步强化了白银的主币地位，使白银更深程度地嵌入国家经济运行的全链条：

其一，赋役折银的全面化与刚性化。明代“一条鞭法”虽确立折银原则，但在北方、边疆地区及民间仍存在实物征调的残余。清廷入主中原后，继承并拓展了赋役折银制度，将其推行到全国，使白银从“可选支付手段”日益成为“强制支付手段”。

其二，财政核算的一元化。明代财政虽以白银为核算主体，但漕粮等部分实物仍需解运京师，中央与地方财政往来存在“银实并行”的双轨现象。这意味着，并非所有财政收入都纳入白银核算体系。清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建立起严密的奏销制度，规定各省财政收入无论原征形态如何，年终造册上报户部时必须统一按白银计量。至此，白银成为国家财政收支、官员俸禄发放、军费筹措调拨的唯一计量基准。

其三，美洲白银供给的制度化。明代大部分时间实行海禁，白银进口主要依赖民间走私贸易，官方虽有认识但未形成制度安排。清代康熙年间开设海关，广州、漳州、厦门等口岸成为公开的白银进口通道，使美洲白银供给从“民间走私的自发补充”转变为“国家货币体系的公开依赖”。

清代对白银主币制度的强化，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对美洲白银的刚性需求。欧洲金融资本正是抓住这一契机，通过欧洲商船贸易持续向中国输入美洲白银，仅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向中国输入超过 2 亿两白银，成为清代白银货币发行的核心主体之一，实现了对中国货币发行权的绝对掌控。

二、货币主权沦丧：欧洲金融资本在中国构建“白银货币垄断制度”

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开启了欧洲对美洲的殖民时代。16世纪起，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殖民国家在美洲发现并开发了秘鲁波托西、墨西哥等世界级大型银矿，16—19世纪美洲白银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80%以上。欧洲金融资本作为殖民美洲背后的核心力量，通过“跨洋贸易”伪装，将白银输入中国，逐步掌控了中国的白银货币发行权，在明清两代构建起隐秘的“**白银货币垄断制度**”，展开对中国铸币税的系统性掠夺。这一制度的本质，是中国货币主权沦丧，使欧洲金融资本成为中国货币体系的实际掌控者和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

（一）欧洲殖民美洲：白银的近乎零成本开采与全球供给垄断

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发现和开采银矿，为提升开采效率，他们将改良后的水银提炼法（汞齐法）引入美洲白银开采，大幅提升了白银的回收率与开采量，使美洲白银产量实现爆发式增长，成为全球白银供应的绝对核心。

欧洲金融资本依托军事优势，通过武力征服迫使美洲印第安人和从非洲贩运来的黑人奴隶充当免费劳动力，在银矿中从事高强度、高风险的开采工作。这些人大量死于过度劳累、疾病与矿难，而欧洲殖民者只支付了极少的军事管控与技术运营成本，实现了美洲白银的近乎零成本开采。同时，欧洲金融资本通过“殖民征服→资源垄断→技术控制”的完整掠夺链条，实现了对美洲白银从开采、运输到流通的全程垄断，牢牢掌控了全球白银的供给权。

在实现白银近乎零成本开采后，欧洲金融资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白银转化为实际的财富与资本。而彼时的中国，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商品在全球具有极强的竞争力，是欧洲各国急需的高价值商品；尤其是中国的自产黄金，更是欧洲金融资本的核心掠夺对象。因此，欧洲金融资本几乎从一开始就将中国视为铸币税掠夺的核心目标。

（二）白银入华路径：跨洋贸易伪装下的货币发行

欧洲金融资本将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路径，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1.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16—17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将从美洲开采的白银运至其殖民地菲律宾马尼拉，再以白银为支付手段，套取中国商人从东南沿海运来的优质商品，这些白银最终通过民间贸易渠道流入中国内地，成为明代白银主币化的核心物质支撑。

2. 欧洲商船贸易。18世纪后，墨西哥银矿产量激增，成为全球白银供给的核心来源，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的金融资本打着“海外贸易公司”名号，纷纷参与到对华“白银货币发行”：将美洲白银运至欧洲后，再通过广州、厦门等通商口岸直接输入中国。

与第一阶段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相比，欧洲金融资本在第二阶段的商船贸易中对

中国的白银货币发行更加直接与深入：他们在广州设立商馆，直接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能够实时掌握中国市场的白银供需情况，精准调整白银输入规模。当中国商品供给充足时，便增加白银输入量，套取更多商品；当中国商品供给减少时，则减少白银输入量，维持白银的稀缺性。通过这种方式，欧洲金融资本实现了对中国白银货币供给的有效控制，牢牢操控了中国的经济运行，为系统性窃取中国铸币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白银货币垄断制度形成：系统性地“窃取”中国铸币税

美洲白银能够持续大量流入中国，本质是白银走私推动以及中国白银主币化的制度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欧洲金融资本在此过程中，通过白银供给垄断逐步掌控了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在明清两代构建起了隐秘的“白银货币垄断制度”。这一制度的形成，并非通过武力征服，而是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虽然明代官府在初期有所警觉，但逐步开始麻木，再到毫无警觉，直到清代始终未能察觉这一严重制度陷阱，最终导致货币主权彻底沦丧。

白银货币垄断制度的形成，源于三大核心原因：

其一，白银主币化后的刚性需求，使中国不得不依赖美洲白银供给。万历年间“一条鞭法”推行后，白银成为法定赋税货币，国家财政与民间经济对白银形成了刚性需求，而中国本土白银资源匮乏，使美洲白银输入成为唯一选择。

其二，中西方贸易的单向性，使中国只能以白银作为贸易结算手段。明清时期，中国商品凝聚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精湛技艺，在全球具有极强的竞争力，是欧洲各国急需的高价值商品；而欧洲各国的手工业发展水平远低于中国，缺乏能够与中国对等贸易的商品，只能以白银作为唯一支付手段，形成“中国输出商品、欧洲输入白银”的单向货币发行格局。

其三，白银的窖藏与沉淀，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对美洲白银的依赖。白银在明清两代主币化后，其作为价值贮藏手段的职能被无限放大，导致大量白银被官僚系统通过横征暴敛、贪污受贿、高利贷盘剥等方式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窖藏，退出了市场流通。例如据野史记载，清朝权臣和珅的私家银库，可抵大清数十年岁银。这导致无论欧洲金融资本向中国输入多少白银，市场上的白银流通量始终不足，始终处于通货紧缩状态。

正是以上三个方面原因，使欧洲金融资本逐步实现了对中国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在这一货币垄断下，欧洲金融资本掌握着白银的供给权，中国只能被动接受其制订和伪装的各类“贸易规则”，实际是货币发行规则，并且常常在出口商品时面临被挑三拣四的困境。这一困境的本质，与当今美国对华贸易战如出一辙：它既要掠夺铸币税，还要不停地打磨、规训被掠夺者。

三、超级假币入侵：白银货币垄断制度的掠夺本质

欧洲金融资本在中国构建的隐秘白银货币垄断制度，本质上是西方对中国持续三百年的跨国“超级假币入侵”。

明清时期，中国官方自行开采冶炼的白银，虽然数量有限，但经国家许可，铸币税归财政体系所有，属于中国的合法真币。而欧洲金融资本向中国输入的美洲殖民白银，虽在物理形态上与中国本土白银没有差别，却在货币本质上构成了典型的假币：

（1）非法货币发行：未经中国官方授权，不具备合法地位；（2）攫取中国铸币税：以近乎零成本的白银，无偿占有中国丝绸、瓷器、黄金等高价值社会经济产出。

我们还可以更形象地理解：欧洲殖民者在美洲挖取“石头”，用来交给中国人，说这是钱，然后堂而皇之地换走了中国的优质商品。如果说这都不算假币，那世上就没有假币了。

这一长期性的白银假币入侵，本质与古代私铸铜钱、伪造大明宝钞、现代私印人民币并无二致。区别仅在于，前者是跨国性质、有组织的系统性大规模假币入侵掠夺，后者是国内个体的零星犯罪。其目的都是为了非法占有社会财富，因此，这场白银假币入侵比任何战争都更具毁灭性：因为它持续三百年的时间跨度太长，硬生生地将一个国家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偷走，足以彻底掏空任何强大的经济体。

四、大国失血：中国铸币税流失转化为欧洲金融资本积累和工业革命

欧洲金融资本对中国展开铸币税掠夺，使中国经济持续失血，历经了“两轮递进”的清晰阶段。第一轮是“白银贸易”伪装下的隐秘窃取：他们利用近乎零成本的美洲白银，套取中国的高价值商品，无偿占有中国的铸币税收益，这一阶段持续三百年，是铸币税流失的核心阶段；第二轮是鸦片走私与战争赔款的公开抢劫：他们因19世纪初美洲白银来源枯竭，转而通过鸦片走私掠夺中国白银和武力入侵索取战争赔款，再用来持续窃取中国铸币税。这两轮铸币税流失，一方面完成了欧洲金融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推动了工业革命；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掏空了中国发展根基，使中国经济从世界巅峰跌落至积贫积弱的谷底。

（一）首轮铸币税流失：白银贸易伪装下的铸币税隐秘窃取

1. 窃取

欧洲金融资本对中国的铸币税掠夺，核心是依托“近乎零成本白银套取高价值商品”的窃取模式：他们在美洲开采白银的成本极低，而中国商品凝聚了无数工匠血汗，具有极高的价值与附加值。在这一过程中，欧洲金融资本把中国商品（铸币税）拿到以欧洲为主的全球市场出售，赚取超额利润，然后逐步兑换为黄金，作为核心资本载体锁进库房，同时也建立起了豪华办公楼与交易大厅等金融基础设施。

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其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在欧洲对华“商船贸易”中成为主导者，其对中国发行的白银货币占清代白银入华总量的半壁江山。这些货币发行

带来的巨额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回伦敦，滋养了英国本土的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市场，使得伦敦在 19 世纪初崛起为世界金融中心。

1816 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从法律上正式承认黄金作为货币本位发行纸币；到 19 世纪末，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推行了金本位制。

欧洲金融资本持续掠夺中国铸币税，并非为欧洲底层人民带去了多少民生福祉，但却为其中上阶层带去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他们获得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物质财富，用于推动经济循环和增加财政收入，然后建设学校、开办教育，请人在大学里充分研究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技术。这实际是用中国的铸币税为欧洲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综合起来，欧洲金融资本的原始积累，逻辑链条可概括为：“殖民美洲→开采白银→套取中国商品（窃取铸币税）→获得超额利润→兑换黄金→积累核心资本”；这一过程也推动了欧洲工业革命，核心逻辑链条是：“窃取中国铸币税→奠定中上阶层物质基础→开办学校→发展教育→科技研究→工业革命”。

2. 被窃取

从原料种植到成品制造、再到物流运输，中国明清两代将全国大量最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出口商品生产，最终只是换得了来自美洲的“白银超级假币”。因此，中国在持续三百年间，仅仅从欧洲金融资本手中获得了白银这一空洞的货币符号，却失去了海量的核心社会经济产出和民生急需的物质保障，导致经济发展根基被逐渐掏空：

（1）在白银主币化之前，中国长期掌握自己的货币发行权，铸币税主要用于国内循环，例如用于弥补国家开支和改善民生。这使国家财政相对充裕，能够推动轻徭薄赋和发展教育，所以中国古代经济发达，产生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等四大发明，这些发明深刻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成为孕育现代文明的基石；同时也造就了汉唐盛世。

（2）在白银主币化之后，中国失去了这一庞大的铸币税收入，引发了巨大的财政缺口，官府不得不通过各种苛捐杂税和巧取豪夺将压力层层转嫁给底层民众，否则政权根本无法运转。这种重税盘剥导致民间屡屡出现“十粮九税”的惨状，民众因此极端贫困，长期处于生存危机之中，无钱发展教育，造成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为什么在近代史上，很多原创科学技术产生于欧洲，而看不见中国科技的踪影？这是因为你不能指望人们在草棚和土屋里研究化学和物理吧。

以上表明，欧洲工业革命的原始资本积累并非源于对美洲的直接掠夺，也并非源于其自身制度或技术的绝对优势，而是通过长期窃取中国铸币税，形成“美洲零成本白银（生产货币）→中国高价优质商品（发行货币）→欧洲资本（中国铸币税）”的全球财富转移链条；也正是这个链条，将中国的三百年血汗转化为了欧洲的大量学校、

实验室和工业革命，以及欧洲金融资本库房里闪闪发光的黄金。

（二）二轮铸币税流失：鸦片走私与战争赔款的公开抢劫

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的大规模白银开采，随着 19 世纪初拉美独立战争的爆发导致殖民体系崩溃而最终结束。这导致他们难以继续维持在中国的原有白银货币发行。而与此同时，鸦片因其成瘾性、高利润性与市场刚需性，成为欧洲金融资本对中国实施铸币税第二轮掠夺的升级工具。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 1773 年开始在印度殖民地种植鸦片，并逐年扩大规模和积累生产技术，到 1800 年前后，实现了鸦片的规模化生产。这些鸦片以走私的方式大量输入中国套取白银，它的成瘾性使其迅速在中国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上至官僚权贵，下至平民百姓，均有大量吸食者，成为中国市场的“刚需品”，造成无数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这一阶段的铸币税窃取链条为：“在印度种植鸦片→走私中国→掠夺白银→部分用于套取中国商品（窃取铸币税）→白银净流出”。

在鸦片走私之前，中国长期处于“商品输出、白银输入”的出口顺差格局，而鸦片走私的兴起彻底扭转了这一格局，形成了“鸦片输入、白银外流”的反向格局，引发严重的“银荒”危机。具体表现为通货紧缩程度加剧：白银价格暴涨，农民辛苦耕种的粮食和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收入大幅减少。

面对鸦片走私引发的白银外流与社会危机，清政府的禁烟运动逐步升级，1839 年林则徐虎门销烟成为标志性事件。这一举措直接触动了欧洲金融资本的核心利益。为了维护鸦片暴利，英国以“保护通商”为借口，于 1840 年发动了对华鸦片战争。此时的欧洲已开展工业革命，军事力量得到大幅提升，而中国因三百年铸币税流失，经济根基被掏空、军事力量落后、社会矛盾尖锐，根本无力抵御欧洲的武力进攻，因此鸦片战争以中国的惨败告终。从此开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其中核心条款之一是赔款 2100 万银元（约合 1500 万两白银）。此后，西方列强又相继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侵华战争，均以中国战败告终，为此清政府需要陆续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北京条约》赔款 1600 万两白银，《马关条约》赔款 2 亿两白银，《辛丑条约》赔款 4.5 亿两白银，加上利息共计 9.8 亿两白银。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累计需要向西方列强支付的战争赔款超过 10 亿两白银。但因清政府的现银有限，实际只支付了一部分赔款，其余以关税、盐税、铁路、矿权等作为长期抵押。这些巨额的战争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彻底陷入破产状态。

官府为弥补白银缺口，进一步提高赋税、挤压民生；同时，以“印子钱”为代表的高利贷肆意横行，残酷剥削底层民众；民众为换取白银缴税，不得不以更低的价格出售粮食等核心产出。而在国际市场，中国不得不出口更多丝绸、瓷器等核心经济产

出换回白银。

自 19 世纪初大规模鸦片对华走私以后，中国长期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实物低价换取白银→白银被抢→再用实物低价换回白银”的恶性循环中，不断丧失第二轮铸币税。

至晚清时期，中国已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民众赤贫，大量百姓衣衫褴褛、讨口要饭；官府也极度贫困，衙门年久失修，大量拖欠官员薪俸和军饷；从南到北，几乎看不到一所像样的学校。这样的国家，实际已经从唐宋时期的世界最强国，沦落为穷困潦倒、任人宰割的世界最弱国。

（三）1935 年白银货币体系终结：白银走了，英镑、美元来了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而此时的清廷已如同朽木，一推就倒。

次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仍然长期以银圆为主货币，实际是沿袭了明清的白银货币垄断制度，即需要继续承受西方的白银铸币税剥削。例如，但凡国内生产出来了什么好的商品（茶叶、丝绸、矿产等），都需要首先拿去出口换回白银货币符号。这导致民国经济发展寸步难行。

1935 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宣布以法币取代白银在市场上流通。自此白银正式退出中国官方货币体系。

然而白银走了，英镑、美元却先后来了。1935—1938 年法币与英镑挂钩，之后与美元挂钩；民国政府的央行主要通过买入英镑、美元等外汇发行本币，即将本币发行与外币深度绑定。其运行逻辑可概括为：“企业出口商品→收到英镑、美元→民国央行买入外汇→发行本币”。这实际是用出口货物换回外汇符号，与明清两代出口货物换回白银符号无本质区别。这些外汇一部分大量用于进口武器、发动内战，另一部分被少数官僚侵吞，成为其移民海外的资本。这导致纸币越发越多，以 1948 年的金圆券为例，最后成了废纸。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彻底终结了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开始拥有了真正的货币主权与经济独立。

五、人力资本枯竭：持续三百年铸币税流失的毁灭性冲击

如果说唐宋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科技和经济巨人，那么在明清两代因铸币税长期外流而持续流血，直到晚清时期已经油尽灯枯、骨瘦如柴。具体表现为明清两代的物质资本被掏空，然后导致人力资本枯竭。

（一）表层冲击：物质资本被系统性掏空，国家陷入赤贫困境

明清两代三百年间，中国始终以丝绸、茶叶、瓷器、漆器、黄金等核心社会经产出，向欧洲金融资本换取美洲白银，海量物质财富如同江河入海般持续外流；然而所获得的白银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货币符号，既不能当饭吃果腹，也不能当衣穿御寒，实际毫无民生价值。最终国家“**穷得只剩下白银**”：一方面，大量白银逐步进入极少

数官僚、买办、高利贷资本的包里被窖藏；另一方面，朝廷丧失了货币发行权和铸币税收益，使财政根基从源头崩塌。为了维系政权运转，官府只得对民间展开竭泽而渔的重税盘剥，最终陷入“越征越穷、越穷越征”的恶性循环。

这一循环的后果是物质资本逐步被系统性掏空：官府既无力修缮水利、改良农业，也无力更新军备、建设公共设施；衙门破败、军备落后、战马饥瘦、公共服务缺位成为常态；民间经营实体也无力投资新式机器、改进工坊和改良技术，使工业经济始终停留在手工劳作的低水平，难以向近代工业转型；民居建筑年久失修，日渐破败。最终形成民间、军队与官府三方无米下锅的赤贫困境。

广大底层民众长期蜗居在四壁漏风、破败不堪的草棚土屋中，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常常以野菜、树皮充饥，卖儿鬻女是常态，也不乏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瘟疫、饥荒时常来袭，外出乞讨者络绎不绝，饿殍千里的惨状在明清中晚期屡见不鲜，饥民起义此起彼伏。这一民生惨状，与近代以来非洲在跨国铸币税掠夺下，无数人民流离失所、忍饥挨饿、骨瘦如柴，在贫瘠土地上绝望挣扎的悲惨境地如出一辙。即便是在所谓的“康乾盛世”，这种民生赤贫也并非个别地区的现象，而是遍及全国的普遍情况；其所谓的“盛世”，不过是一种虚假繁荣，是建立在底层民众赤贫之上的空中楼阁。

（二）核心冲击：生育与教育双重塌陷，人力资本逐步枯竭

持续三百年的铸币税流失，不仅掏空了物质资本，更直接冲击生育与教育两大核心环节，造成生育困难与教育塌陷的双重恶果，最终导致“人力资本枯竭”。这使得明清的王朝更替沦为“空壳式”的政权易主。国家实际已经失去了“创造财富、传承技术、发展文明”的核心主体。

首先，赤贫困境引发人的再生产断裂，使人力资本的“数量根基”受到根本侵蚀。家庭生育看似私人行为，实际是需要物质支撑的基础性社会行为，而明清两代底层民众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系，更无能力承担家庭生育成本：一方面大量百姓因贫困难以娶妻生子；另一方面即使生下孩子，也因营养不良、缺医少药而很容易夭折。尽管从表面上看那时社会仍然保有一定的生育率，但那只是没有现代节育条件带来的假象，真相在于：孩子生得多、能成年的少，夭折率极高，导致人均寿命极低。因此，那时人力资本的“数量根基”不体现在人口数量上，而是体现在成年率和人均寿命上。

其次，赤贫困境导致教育体系全面坍塌，使人力资本的“质量根基”彻底丧失。教育是传承知识、培育人才、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核心载体，而明清两代铸币税流失后，从官方到民间，均已无能力支撑教育的发展：官府因财政崩溃，官学体系名存实亡，府学、县学因经费枯竭停止办学；民间因赤贫，百姓无钱送子女读书，私学因生源短缺、经费不足基本关门，最终形成“无校可上、无钱可读”的局面。这导致除极少数富家子弟外，其他民众基本上都是文盲。在这一背景下，大量精湛的手工技艺因

无人继承而逐步失传，传统科技与生产技术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三）基础垮塌：国家失去发展根基与内生动力，错失文明转型历史机遇

明清两代的人力资本枯竭，使社会陷入技术断层、经济梗死与国防失能的多重绝境：全民基本文盲导致社会失去技术革新与知识传承的主体，不仅无法催生近代科技革命，甚至连传统技艺也面临失传；人的再生产断裂与消费能力崩溃，导致“无人生产、无钱消费”的恶性循环，使经济循环彻底梗死。

这种由人力资本枯竭引发的全方位基础垮塌，使明清的衰落超越以往王朝更替的周期性困境，从根本上失去了抵御外部风险、实现自我复苏的内生动力。

六、国运衰竭：白银货币垄断制度下的明清王朝更替和晚清列强入侵

明清两代持续三百年的铸币税流失，首先掏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使民生陷入绝境，社会矛盾持续激化，进而引发了明末清军入关以少胜多的王朝更替，以及晚清西方列强入侵。这一结果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白银货币垄断制度下的历史必然。

（一）从表面看：手无寸铁的赤贫困境

明朝的覆灭，固然有封建统治制度自身的腐朽、政治僵化、宦官专权等原因，但这只是王朝更替的表层原因；而深层根源，在于欧洲金融资本构建的白银货币垄断制度导致中国铸币税长期外流，再加上国内“印子钱”之类的高利贷金融资本残酷剥削，最终引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到明朝中晚期，官府、军队和黎民百姓实际都已陷入赤贫困境，例如官员欠薪、军队缺饷，大量人口长期缺食少穿，引起政务废弛、军人哗变，饥民起义此起彼伏。整个国家实际早已失去了抵御外敌入侵的基本物质条件。这导致清军入关后势如破竹，实现了以极少数人口战胜绝大多数人口的历史结局。而这一结局，并非取决于清军的武力有多强大，而是明朝内部力量早已土崩瓦解，不堪一击。当然，这只是华夏民族内部的政权更迭与矛盾化解，与此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性质完全不同。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百年屈辱的历史深渊。这一悲剧结果的出现，同样并非西方的武力不可战胜。而事实上，鸦片战争前期的大清帝国也早已极度衰弱，实际与大明王朝的晚期衰弱并无实质不同，也早已不堪一击。

（二）从实质看：无人可战的老弱幼小

面对清军入关，晚明并非没有抵抗——从辽东防线到山海关，从扬州十日到嘉定三屠，明军将士浴血奋战，江南士民殊死抗争。同样，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晚清并非没有军队，也并非没有抵抗——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清军屡屡出战；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民众也曾奋起。然而，这些抵抗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其深层根源，在于明清两代长期性的铸币税流失，已使国家的人力资本陷入全面枯竭。

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数量枯竭：由于夭折率极高，大量孩子活不到成年，因此社会大众以未成年的幼小者居多，再扣除老年人后，真正具有抵抗能力的青壮成年人只占少数，社会已陷入“无人生产、无兵可战”的经济与军事双重困境；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质量枯竭：具备政务治理、军事指挥、社会统筹能力的专业人才少之又少，万里挑一。

因此，清军入关以少胜多的王朝更替和西方列强欺凌瓜分中国，实际是明清两代中国人力资本枯竭后，经济体系与治理体系双重崩塌的必然结果。这是根本性的国运衰竭。

七、从王朝周期律观察：欧洲金融资本摧毁了明清王朝更替的内生修复机制

中国自奴隶社会以来建立起的“王权货币垄断制度”，因存在“剥削生育劳动价值本源，导致货币分配失衡”的根本缺陷，使经济发展逐步陷入严重困境，最终使王朝必然衰落；但同时，该制度也蕴含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核心思想，能在新王朝建立初期产生经济重建的内生修复机制。因此，这一制度能够通过王朝更替来实现对经济困境的周期性化解，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的王朝周期律。然而，欧洲金融资本利用美洲殖民白银垄断中国货币发行权，把货币垄断制度的内在缺陷无限放大，彻底摧毁了明清王朝更替的这一内生修复机制。为了准确理解这个问题，以下从中欧的古代货币制度对比谈起。

（一）古代中欧的货币制度对比分析框架

1. 中国以“天下为公”思想主导下的王权货币垄断制度

早在奴隶社会的夏、商、西周直至后续封建王朝的王权治理实践中，中国便已逐步形成“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君主代表天下公共利益行使权力，垄断货币、土地、礼乐等核心公器，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民生安定、抵御外患与自然灾害；秦始皇统一六国，以结束长期战乱为核心目标，以及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和郡县制等治国方略，都是这一“天下为公”思想的具体表现。

中国古代先贤提出民为邦本、仁政王道、民贵君轻的政治思想，以及农民起义喊出“等贵贱、均贫富”的社会理想，表面上均指向政治秩序的建构，实质上却蕴含着对经济公平与分配正义的最朴素、最本源的追求，都是对天下为公思想的具体展开。这些思想的产生并非偶然。中国古代王朝更替尽管充满血腥，但是新朝建立后，社会能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人们普遍能够感受到安全感与稳定预期，进而形成对集体秩序、公共治理与国家共同体的信任与认同。这种以统一、安定、公平为核心的历史经验，正是天下为公思想得以生根、发展并成为中华文明深层价值内核的社会土壤。

天下为公思想的核心是：强调“整体观、共利观”。这一思想在中国“王权货币

垄断”制度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从夏朝开始，王权垄断铸币资源，统一发行货币，用于王室开支、官员俸禄、军事供给等财政刚需；也用于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和城市建设等民生发展；在经济严重困难时期，王室还会主动节制用度。其实质是“铸币权公用”，本质是对天下为公思想的落地应用。这一相对发达的货币制度，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既催生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重大科技进步，也造就了汉唐、宋元的经济鼎盛，使中国在古代长期雄踞世界经济中心。

高利贷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顽疾，它几乎与货币同时代产生。例如，在奴隶社会，掌握货币的大奴隶主、祭司，通过高额利息向自由民和中小奴隶主放贷，当债务人无法偿还时，其自身及家庭成员常被强制抵债为奴，为奴隶制不断补充奴隶来源；进入封建社会后，高利贷逐步以当铺、钱庄、印局、账局等形式稳定下来，尤其以印局的“印子钱”为野蛮剥削代表。

基于天下为公思想，中国古代王权常常对高利贷进行约束和打击，展开了长期性斗争。例如汉代法律规定了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严禁“取息过律”；唐代以法律明确限制高利贷利息，禁止利滚利；宋代多次颁布法令，用刑法严厉打击“倍称之息”等恶性高利贷。

以上王权货币垄断制度下的铸币权公用和对高利贷约束，是天下为公思想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正是这一制度和思想的长期支撑，使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因此，天下为公与铸币权公用的“思想—制度”组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核心根基。

2. 欧洲以“个人本位”为主导、以高利贷为核心的私有货币制度

在 16 世纪之前，欧洲长期处于政治分裂、封建割据状态，王权弱小，贵族与教会势力强大，各城邦、领地、贵族均可自行铸币，货币种类繁杂、成色混乱；铸币权与高利贷私人资本高度结合，权钱合一、野蛮生长，形成“私有货币制度”。尽管部分王国曾试图加强铸币权控制，但从未建立起类似中国高度统一的王权货币垄断体系。

正是欧洲长期分裂割据、战乱不断、人人自危的历史，造就了西方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社会思想基础，并逐步形成个体观、私利观、殖民观与霸权观。也正是这一思想体系，推动欧洲金融资本自 16 世纪起，展开了对美洲的殖民统治、长期窃取中国铸币税，并且也造成了如今的美元霸权。

3. 两种货币制度的核心差异

中国古代的王权货币垄断制度，铸币权主要用于王室、官俸、军队等财政开销和民生发展，其核心目标是服务于国家运转，而非资本增殖；这一制度与高利贷有着严格的区别，并且常常主动打击高利贷。

而欧洲的古代理有货币制度，铸币权与高利贷资本深度交织、高度统一，其核心目标是以黄金为终极载体，追求金融资本的无限增殖。正是这一内在机制，引发了近

代史上的殖民扩张，最终演化为席卷全球的掠夺浪潮。

这两种货币制度，既反映出了中西方文化“天下为公”与“个人本位”的根本性差异，也体现出了古代中西方发展道路的根本不同。也正是这种差异，导致西方在古代社会长期落后于中国发展。

（二）中国古代“王朝周期律理论模型”

王朝周期律起因于货币垄断制度的根本缺陷，叠加高利贷失控的强制催化，导致王朝必然走向衰落；但该制度具有强大的内生修复机制，能让社会产生革命的强烈渴望和强大力量，进而推动了王朝更替；新朝建立后启动修复机制、实现经济复苏，如此周而复始。

1. 货币垄断制度的根本缺陷：货币分配失衡，导致货币集中与供需断裂

相比欧洲的私有货币制度，中国王权货币垄断制度具有资源集中、服务国家与民生发展的显著优势。但是这一制度也存在“剥削生育劳动价值本源，导致货币分配失衡”的根本缺陷，造成两方面严重后果：一方面，货币在垄断发行过程中，被通过贪污截留、高薪俸禄、利润分配等多种途径直接大量流入少数官僚手中，要么窖藏，要么转化为高利贷金融资本，导致“货币集中”；另一方面，广大育儿家庭缺钱消费，使社会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产生销售和就业困难，导致“供需断裂”。

2. 高利贷失控的强制催化：制造赤贫困境，使生产和消费共同湮灭

从汉唐宋官府严厉打击高利贷可见，高利贷是真正的人类社会顽疾：它通过高息放贷实现“钱生钱”，盘剥底层民众，具有短期暴利的核心特征，自然屡禁不止。因此，官府出于公共利益需要打击高利贷是一回事，但高利贷被少数实权官僚长期掌控，实际普遍存在于社会、并在王朝中晚期严重失控是另一回事。这一经济乱象甚至已延续至现代社会，以网贷为典型变种，借助互联网渠道直达每一个人而广泛存在。

古代的高利贷依赖强力催收方能维系，若无官僚权力庇护则难以长期运转，因此它本质上是钱权结合、官商一体的产物。

高利贷的破坏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生产端**，它通过高息盘剥地主、农民与手工业者，常常导致大量经济破产与流亡；另一方面，**在消费端**，越来越多的货币被高息强制转化为金融资本，滞留于高利贷系统里自我循环，导致社会大众手里可用于民生消费的货币越来越少。这造成王朝中晚期严重“钱荒”、社会消费力逐步枯竭和经济大萧条。

综合起来，高利贷追求“钱生钱”的金融资本无限增殖，逐步使社会陷入赤贫困境，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共同湮灭。其内在机制可概括为：“货币垄断→分配失衡→直接流向少数人→转化为高利贷金融资本→钱生钱剥削→金融资本无限增殖→民间货币逐步清零→赤贫困境→产消湮灭”。

3. 消费逐步枯竭→社会再生产逐步停止→王朝更替

由于高利贷资本的残酷剥削，民间货币越来越少，导致王朝中晚期社会消费能力逐步枯竭，例如农民无钱购买农具与日用品、广大普通家庭无钱生育孩子。这一消费枯竭直接切断了社会再生产循环：生产部门因无利可图而难以为继，大量手工业者、地主和小农经济破产，土地抛荒、流民激增。同时官府因税基萎缩而陷入财政危机，常常拖欠官俸和军饷，已无力维持统治与镇压民变。最终，底层民众在赤贫困境下揭竿而起，再结合官兵哗变，共同推动了王朝更替。

在王朝更替过程中，谁能把“天下为公”的口号喊得越响亮和落到实处，谁就能汇聚人心、凝聚强大的革命力量，成为新的王者。

4. 新王朝的“内生修复机制”与周期性轮回

新王朝建立之初，普遍会兑现“天下为公”的革命承诺——通过两种途径获得海量货币，坐拥雄厚财力，用于重启经济循环：一是盘活存量货币，即没收前朝官僚与高利贷资本窖藏的金属货币；二是注入增量货币，即垄断新货币发行权。新王朝把这些货币大量投放于生产领域，例如兴修水利、改良农业、赈济灾民、修缮公共设施，并辅以轻徭薄赋政策，为民间经济复苏创造条件和空间。这种“盘活存量货币+注入增量货币+休养生息”的组合，构成了王朝初期的“内生修复机制”。

例如，汉高祖刘邦推行“轻徭薄赋”，将田租从秦朝的“泰半之赋”降至“十五税一”；唐太宗李世民以“存百姓”为念，省徭赋、劝农桑；明太祖朱元璋提出“安养生息”的国策，兴水利、给牛种。

正是这一内生修复机制，使秦汉唐宋元诸朝能够在王朝更替后快速实现经济复苏与国力提升。其核心机制在于：经济循环重启后，社会再生产体系逐步恢复，人口繁衍与增长步入正轨，官学、私学等教育体系得以重建，使国家人力资本的“造血功能”得以延续。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到王朝中晚期，货币再度大量集中于高利贷资本手中，使新一轮的赤贫困境与产消湮灭重演，开启下一个王朝周期。

综合上述，中国古代的王朝周期律可概括为两条历史规律：

（1）经济规律：“货币垄断→生育困难→高利贷失控→民生凋敝→文明衰退→动荡战乱→王朝更替”；

（2）社会规律：“经济重建（休养生息→支持生育）→分配失衡→动荡战乱→推倒重来”。

（三）欧洲金融资本摧毁了明清王朝更替的内生修复机制

明代以前，王朝更替尚能通过“内生修复机制”重启文明进程；然而自明代中期开始，欧洲金融资本通过白银货币垄断制度，将中国的货币发行权攫取至境外。这一外部掠夺带来双重打击：其一，铸币税持续外流，使国内长期持续丢失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引发赤贫困境；其二，即使实现明清王朝更替，清廷因没有货币发行权、无

法获取铸币税，从一开始便陷入财政困境，不得不重税盘剥，使新朝彻底失去了“休养生息”的制度空间。

这一外部掠夺史，改变了中国明清两代的王朝周期律，使中国从唐宋时期的世界经济巅峰，滑向了明清时期不可逆转的积贫积弱与落后挨打之路，形成了一条新的历史规律：“铸币税失窃（物质资本外流）→无法休养生息→生育困难→人力资本枯竭→国运衰竭”。

八、核心症结：明清国运衰竭的根源不是发展问题，而是铸币税失窃问题

中国明清两代并非因生产技术与发展基础的天然落后而走向衰落，相反，彼时中国的核心生产能力仍具备显著优势：（1）农业领域，精耕细作模式持续发展，曲辕犁、龙骨水车等农具应用成熟，稻麦复种、轮作套种等耕作技术不断优化，梯田、圩田等土地开发方式广泛推广，粮食亩产和农业生产效率远超当时欧洲多数地区，且经济作物培育、农副业结合的技术积累，让农业经济拥有较强内生韧性；（2）手工业领域，丝绸、瓷器、茶叶等传统品类的制作技艺仍居全球顶尖水平，产品在国际市场具备无可替代的竞争力。

这份硬核的生产实力与技术积淀，根植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勇于进步、不断革新的改革精神，而这一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坚韧不拔的重要基础。依托这一基础，中国能在汉唐、宋元的鼎盛时期缔造出辉煌的经济成就，还取得了四大发明的重大科技成果。只是再殷实的家底、再雄厚的根基，也经不起长达三百年的系统性失窃。

学界关于明清衰亡的传统叙事，多将其归因于封建统治的腐朽与僵化。然而，这种判断更多是基于现代文明标准对古人展开的外部道德评判，并非对内在经济机制的揭示。事实上，欧洲金融资本持续三百年窃取中国铸币税，逐步掏空了中国的物质基础，并且摧毁了中国王朝周期律的内生修复机制，使明清两代人力资本枯竭，失去了发展根基，积贫积弱，走向国运衰竭。这种外部冲击的破坏力远超历史上任何一轮王朝内部的矛盾累积。因此，铸币税失窃才是导致明清国运衰竭的原则性和根本性问题。

九、本质界定：中国明清两代沦为欧洲金融资本的“货币殖民地”

欧洲金融资本对中国展开长期性、规模化的白银假币入侵，本质上是把中国明清两代沦为了西方的“货币殖民地”。所谓货币殖民地，是指一个国家在政治上保持独立，但货币主权被外部力量剥夺，表现为货币供给、货币制度、储备资产被外部控制，铸币税被系统性窃取，货币体系沦为外部资本增殖工具的经济依附状态。

明清两代的悲剧历史证明，货币殖民地的掠夺模式所造成的长期后果非常致命：国家物质资本持续外流、生育与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最终引发人力资本枯竭，走向国运衰竭。正确认识这一历史真相，对于防止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货币殖民地与政

治殖民地有较大区别，以下是对照表：

两种殖民地形态对比表

维度	政治殖民地（如印度）	货币殖民地（明清中国）
控制方式	直接统治、军事占领	经济手段、货币垄断
主权状态	全部丧失	政治上独立，但经济被控制
剥削机制	税收、资源掠夺	铸币税掠夺
严重后果	政治依附、经济畸形、文明断裂	人力资本枯竭、国运衰竭、走向了晚清的半殖民地社会

相比政治殖民地，货币殖民地是一种更隐蔽的殖民地形态：它不需要军事占领，却才能实现同等程度的经济剥削；若把时间无限拉长，两者的历史后果将趋向一致。

综合上述，中国明清两代长期充当贸易顺差国、赚取白银货币符号，其实质是欧洲金融资本凭借白银假币塑造的全球第一个大规模货币殖民地。这一历史定位，是重新理解近代中国衰落、西方崛起与全球经济大分流的核心钥匙。

第五章 欧洲金融资本的剥削技术升级：银行货币垄断制度

16 世纪起，欧洲金融资本与中国展开大规模“白银贸易”，把美洲殖民白银运往中国，再把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优质商品运到以欧洲为主体的全球市场销售。这场持续三百年的跨洋贸易，牵涉商品流通、资金融通、黄金兑换等诸多复杂环节，不仅让欧洲金融资本完成了巨额原始资本积累，更使其产生了全新的剥削认知：相较于直接的实物掠夺，垄断货币发行权是一种更隐蔽、更高效、更具可持续的财富攫取方式。基于这一认知，欧洲金融资本持续推进金融技术与制度的双重升级，逐步构建起全新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与此同时，他们将这一制度同步推广至殖民地，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制度化的金融剥削。而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实践，也为后续欧洲金融资本迁徙到美国构建美元霸权，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储备与技术基础。

一、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确立：从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的范式跨越

1609 年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标志着近代银行制度的正式诞生。从那时起，欧洲金融资本开始从古老的高利贷金融资本逐步向近代银行金融资本转型。

银行产生后，突破了传统金匠铺的单一汇兑与简易借贷功能，开始从事公众存款、信贷扩张、票据结算等综合性金融业务，使银行券（纸币）、存款货币等信用货币逐步流通。其实质是让银行获得了货币发行权，并逐步走向货币垄断。

19—20 世纪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在欧洲最终定型阶段。1844 年英国颁布《银行特

许条例》，将纸币发行权集中于英格兰银行，使其开始充当中央银行角色。从此，英国其他银行逐步失去了纸币发行权，但是它们通过信贷扩张创造“存款货币”的主要货币发行功能丝毫未损。并且存款货币逐步占据了国家货币总量的多数，是货币垄断的真正主体。此后，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相继建立中央银行体系，形成了“中央银行发行纸币（又称高能货币）、商业银行发行存款货币（又称派生货币）”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基本格局。

这一制度的确立，让欧洲金融资本实现了从白银货币垄断到银行货币垄断的范式跨越。其核心变革体现在三个方面：

1. 货币形态升级：从受矿产资源限制、开采运输条件约束的白银金属货币，升级为以银行信用为支撑的信用货币，使货币发行具备了无限扩张的可能性，为金融资本的持续增殖打开了空间；

2. 垄断方式升级：从需要通过殖民征服的白银实物垄断，升级为只需掌控银行体系、制定金融规则的制度性垄断，垄断的实现方式更隐蔽、成本更低、可控性更强；

3. 剥削效率升级：从“白银—商品”的单次、单向交换剥削方式，升级为通过信贷扩张、资产购买、利率调控等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常态化、全方位的持续剥削，剥削效率呈几何级数提升。

二、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全球推广：从欧洲本土到其殖民地的制度性掠夺

欧洲金融资本在 17 世纪建立起新式银行的同时，也同步向非洲、美洲、亚洲的殖民地全面推广，形成具有全球性的银行剥削网络。

在美洲。19 世纪拉美国家独立前，西、葡等宗主国通过设立殖民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将美洲殖民地货币体系与欧洲本土绑定，铸币税收益悉数流向欧洲金融资本；拉美国家独立后，并未掌握真正的经济主权，西方银行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墨、阿、秘等国建立货币垄断体系，既掌控基础货币发行与汇率走势，又通过高息国债、核心产业信贷把控各国财政与经济命脉。这一行为造成拉美各国“债务高企—政权动荡—经济衰退—再借高息债”的恶性循环，使其陷入政治独立、货币殖民与经济依附的被动局面。

在非洲。英、法分别在其非洲殖民地设立专属银行分支机构，将非洲的货币发行、信贷结算等金融活动全面纳入英、法银行掌控。

在亚洲。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掌控印度殖民地货币主权，建立以英镑为锚的货币体系，设立殖民银行垄断印度基础货币发行与信贷业务，把控印度财政税收与核心产业金融命脉。

欧洲金融资本在殖民地推广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建起了以欧洲为核心的全球货币殖民体系，为后续欧洲金融资本迁徙美国、构建美元霸权奠定了全球化制度和技术基

础。

三、剥削机制：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与白银货币垄断制度一脉相承

欧洲金融资本先后构建的白银货币垄断制度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尽管在剥削形式、技术手段、覆盖范围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二者的剥削本质一脉相承，都是以垄断货币发行为核心、以窃取铸币税为目标、以独占铸币收益为最终结果的制度性剥削。详见下表：

两种货币制度的剥削机制对比表

维度	白银货币垄断制度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
核心机制	垄断中国白银货币发行权	垄断欧洲和殖民地的信用货币发行权
剥削手段	以近乎零成本的美洲白银,套取中国高价值丝绸、瓷器、黄金等商品	以近乎零成本的信用货币（纸币、存款货币），换取全球范围内的商品、资产、劳动力等社会财富
铸币税形态	以中国的核心商品实物形态存在	以外汇储备、黄金储备、银行债权、股票资产等金融资本形态存在
铸币税流向	全部被欧洲金融资本独占,成为其原始资本积累的核心来源	全部被银行背后的金融资本独占,成为其资本无限增殖的核心来源
剥削后果	中国明清两代物质资本被掏空，官府、军队、民众陷入赤贫困境，国家的人力资本逐步枯竭,国运走向衰竭	政府部门、家庭部门债务高企；生育衰退，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受损。

以上表格清晰地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并非全新的金融制度创新，而是白银货币垄断制度的逻辑延续与技术升级。欧洲金融资本只是将“垄断货币发行权、窃取铸币税”的古老剥削逻辑，从金属货币领域移植到了信用货币领域。

四、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核心矛盾是货币分配失衡，导致经济循环梗阻

欧洲金融资本发明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存在货币发行与家庭部门生育劳动价值本源脱钩的根本缺陷，造成广大育儿家庭未获铸币税补偿的货币分配失衡，形成“金融资本无限增殖、家庭部门购买力不足”的社会分配结构，导致“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经济循环梗阻。这一矛盾持续累积，最终演化为债务高企、内需不足、生育衰退的系统性经济困境。

以上核心矛盾引发了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银行通过信贷扩张制造虚假繁荣，而大众消费能力严重不足造成大量商品积压；泡沫破裂后，实体经济迅速垮塌、工人大量失业、社会陷入动荡。在此背景下，法西斯势力趁势上台，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后，西方各国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向银行借钱来搞消费和建设，例如财政赤字、发行国债，削弱了银行货币垄断，缓解了部分矛盾。但由于“银行货币垄断与家庭缺

钱生育”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因此只是延缓了危机爆发的时间。

五、理论遮蔽：西方主流经济学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披上“合法外衣”

任何制度的长期存续，都需要相应的理论体系为其辩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也不例外。该制度在确立与推广的过程中，欧洲金融资本有选择性地资助、扶持和推广相关的经济研究，以此寻求理论遮蔽和话语霸权。这样逐步推动和固化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构建。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斯密在书中提出：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便利性，可以节省大量金银，能够扩大商业、生产、消费规模，“增加社会总收入或纯收入”。这一理论恰好契合了欧洲金融资本的核心诉求，被奉为圭臬，成为他们构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强大意识形态武器：他们进行广泛宣传，组织专人撰写教材、培养学生和游说政府。最终推动了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合法化进程。

斯密的理论存在一个根本缺陷：他所主张的“银行印钞能增加生产和收入”理论，实际是把银行部门的“金融资本扩张”误认为是实体经济层面的资本积累与社会收入增加。其本质是在主张由银行部门发行货币。这一理论被欧洲金融资本充分利用，成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奠基石”，推动了金融资本的无限扩张，至今为止，已造成长达两百多年“金融资本无限增殖、民生需求让渡”的经济发展异化格局。

此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斯密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起了支撑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理论体系：（1）“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米什金，2016），将银行发行货币的行为定义为“负债行为”，掩盖了货币发行背后的铸币税掠夺本质；（2）弗里德曼的“货币中性论”（Friedman & Schwartz, 1963），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化仅影响物价水平，不影响实际经济变量，忽视了货币发行权垄断对社会财富分配、民生发展的根本性影响；（3）新古典经济学的“金融深化理论”（麦金农，1973；肖，1973），主张放松金融管制、推动银行信贷扩张，进一步强化了银行部门在经济运行中的核心地位。

以上理论的共同缺陷，在于刻意回避了货币发行掠夺铸币税的根本问题，把银行货币垄断行为包装成“服务经济发展的正常金融活动”。并且，该理论体系被写入教材，不断向老师和学生灌输、不断向大众普及，已成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系统性遮蔽工具，使人类社会形成了意识形态僵化的认知囚笼，让人们把该制度误认为是自然演进结果，把其严重后果误认为是个人失败或自然规律，失去了反抗意志。

第六章 美元霸权的历史渊源、剥削机制与制度基础

一、欧洲金融资本控制了美国，然后塑造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

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北美大陆逐渐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并由欧洲金融资本主导了北美经济发展。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但其经济和金融系统仍然牢牢掌控在欧洲金融资本手中；而更准确的说法是，位于北美的欧洲金融资本为了摆脱宗主国的旧秩序束缚、寻找新舞台，而在财力、人力和物力上予以关键支持，美国才得以宣布独立。这是欧洲金融资本控制了美国，进而塑造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美国从一开始就是欧洲金融资本的工具和宿主，其独立是为了“资本的自由”，而非“人的自由”。

以上表明，美国的资本主义并非“经济决定政治”的产物，而是资本先控制政治权力，再用政治权力为资本服务的结果；它也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欧洲金融资本主动“捕获”国家机器的结果。

二、跨洋大迁徙：欧洲金融资本将“家底”搬运到美国，升级为美元霸权

20 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前夕，位于欧洲的金融资本主体为躲避战祸，开始跨洋大迁徙，将其数百年积累的剥削根基完整移植至美国，使美国从一个区域新兴国家，跃升为世界最强国。他们在美国持续深入研究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全球化扩张方法和技术，经过剥削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后，最终建立起了美元霸权。

（一）战祸来临，欧洲金融资本大逃亡

欧洲大陆分别在 1914 年和 1939 年陷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战火不仅摧毁了实体经济，更直接威胁着金融资本的财富安全。这使原本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伦敦、巴黎、柏林等城市失去了稳定发展环境。

反观大洋彼岸的美国，其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远离战火，坐拥超大规模的国土、持续增长的实体经济与广阔的发展前景，并且与欧洲有着同源的种族文化纽带，必然成为欧洲金融资本躲避战祸、延续资本增殖的唯一理想避难所。因此，欧洲核心金融资本掀起了跨洋大迁徙，成为全球金融资本格局重构的关键节点。

（二）迁徙的不只是资本，更是“家底”

此次跨洋迁徙的规模与历史意义，远超普通的资本移民潮。欧洲金融资本随迁的，是其数百年间通过全球剥削积累的、支撑其货币垄断体系的完整“家底”：

1. 物质财富：大量黄金、白银、艺术品；
2. 金融技术：从白银垄断到银行垄断的整套操作方法；
3. 理论体系：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提供辩护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书籍、刊物等）；
4. 人才储备：顶尖的金融家、经济学家、技术人员；
5. 剥削逻辑：“垄断货币发行权、窃取铸币税”的核心算法。

这批欧洲金融资本抵达美国后，形成了美国全新的金融统治阶级。他们带入的欧洲金融技术，使美国在短短数十年间建立起成熟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实现金融体系

的跨越式发展；他们带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这一制度提供了意识形态掩护与理论支撑；他们带入的剥削逻辑，成为日后美元霸权的思想源头与底层遵循。

三、美元霸权：将古老的剥削逻辑推向全球

美国新的金融统治阶级形成后，开始主导欧洲乃至全球金融格局。他们不断研究剥削技术的核心算法并付诸实践，将“垄断货币发行权、窃取铸币税”的古老逻辑，从美国出发，推向全球每个角落。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全球纳入美元体系

1944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美国主导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会议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35美元），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

这一体系的设计，处处可见欧洲金融资本的身影。出席会议的英国代表团团长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本身就是欧洲金融资本培养的顶级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的核心决策层中，多有欧洲移民背景的金融家和经济学家深度参与。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本质是美国金融统治阶级将其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向全球推广的制度载体。这一体系的核心机制是：各国为开展国际贸易、维持汇率稳定，必须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各国银行部门以美元为锚定发行本币，本质是将本国货币主权让渡给了美国金融资本。

（二）IMF 与世界银行：掌控规则制定权

194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成立，美国金融统治阶级掌控了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的人事权与投票权。

这两大机构的功能，远非“国际合作”那么简单。它们通过制定全球金融规则、提供贷款、实施金融援助等方式，强制各国接受“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与美元本位”。发展中国家为获得贷款与援助，不得不接受苛刻的经济改革条件：开放金融市场、取消资本管制、接受美元结算。本质是丧失货币主权。

这一机制，与明清时期欧洲金融资本通过“白银贸易”控制中国货币供给，如出一辙。区别只在于，当年的控制手段是白银流入规模，如今的控制手段是国际金融规则。

（三）石油—美元绑定：延续霸权的新锚点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从表面看，美元霸权势弱；实则，美元霸权早有预谋和后手。

1974年，美国与中东石油生产国达成协议，规定石油贸易必须以美元结算，形成“石油—美元”绑定机制。这一机制的核心效应是：各国为购买石油必须持有美元，强化了对美元的刚性依赖。这样，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转身与石油（工业的血液）重

新绑定，霸权得以延续。

此外，美国分别在 1970 年和 1973 年构建起 CHIPS、SWIFT 全球支付清算体系，掌控了全球货币支付的核心通道；还通过持续发行美债、推动金融市场自由化等方式，进一步巩固美元的全球核心地位。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大规模发行美元，将危机成本转嫁全球。

（四）第一赌场：国际资本流动，美元霸权的核心收割机

受《国富论》主张“银行印钞能增加生产和收入”的严重误导，各国普遍形成“美联储印刷美元来投资可以发展经济”的心理依赖，而看不到美元霸权“超级假币入侵”的掠夺本质。这实际是一种投机心理，然后被美元霸权深度利用。

美元霸权极力推销资本自由化，通过“资本账户开放”这一制度安排，将各国金融市场与美元体系深度绑定。当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美元以极低成本涌向全球，推高他国资产泡沫；当美联储加息或制造地缘动荡，美元又大规模回流美国，引发他国汇率崩盘、资产暴跌，美国资本则趁机以低价抄底核心资产。这一“流入推高一流出抄底”的完整闭环，使国际资本流动成为美元霸权周期性收割全球财富的核心通道。例如，2022 年 4 月，斯里兰卡宣布“国家破产”，成为美联储加息周期中第一个应声而倒的新兴市场牺牲品；2025 年前后，中东局势动荡殃及池鱼，使土耳其金融市场动荡、里拉货币剧烈贬值。

国际资本流动的本质是，美元霸权利用其美元货币发行权带来的资本数量绝对优势“坐庄”，形成各国人民与美元霸权血拼的“第一赌场”。各国因此而反复掉入“19 世纪西方通过鸦片走私和战争索赔抢劫中国白银”那样的重大经济陷阱：“低价出口商品换取美元→美元被抢→再次低价出口商品换回美元”，形成恶性循环，不断丧失第二轮铸币税。这种铸币税的丧失，最终都将以通货膨胀的形式转嫁给国民，形成一贫如洗的民生困境。

（五）第二赌场：黄金交易，美元霸权的全球财富绞肉机

从表面上看，美元早在 1971 年与黄金脱钩，但那只是一场预谋，目的是为了开设黄金赌场，既巩固美元霸权，又实现了剥削技术再升级。

黄金是欧洲金融资本带到美国的数百年剥削成果和基因，可见其重要性。长期以来，他们背后积蓄、操纵黄金的本能有增无减。例如据美国财政部公布数据，截至 2026 年初，美国官方黄金储备量为 8133 吨，遥遥领先、稳居世界第一。此外，美国华尔街投行掌控着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的黄金期货交易，主导全球黄金定价权，而他们私库中的黄金不计其数。以上黄金既是美元霸权的关键物质支撑和历史遗产，无言地见证了西方金融统治阶级对全球实施的系统性剥削；也是美元霸权设立黄金大赌场的坐庄本钱。

自美元与黄金脱钩至今，五十余年间，全球黄金价格总是隔几年周期性地暴涨暴

跌，其中 2024—2025 年的上涨周期更是成倍增长。其本质是西方金融统治阶级的剥削技术再升级：他们凭借压倒性的黄金储备数量与美元货币发行权带来的资本数量绝对优势“坐庄”，通过制造价格剧烈波动来周期性地收割全球财富。其基本特征是暴涨、暴跌：不把对手盘打爆仓，绝不回头，也即通过极端波动强制出清对手盘，完成财富再分配。因此，黄金交易实际已成为全球投资者与美元霸权血拼的第二赌场。

（六）第三赌场：虚拟货币交易，美元霸权的数字延伸与隐形掌控

进入数字时代，美元霸权并未止步于传统金融体系的垄断，而是延伸至虚拟货币领域，通过有意布局实现对数字金融的实质掌控，为美元霸权筑起新的护城河。这种掌控并非通过直接“发行官方虚拟货币”实现，而是采取了“资本掌控+规则绑定+技术主导”的隐蔽路径：

1. 资本深度掌控：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通过私募股权、战略投资等方式，大规模入股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的核心生态项目（如矿企、交易所、钱包服务商），掌握其底层决策、资本流向、价格波动，使虚拟货币的交易规则与美元体系深度绑定；并且它们凭借美元货币发行权带来的绝对资本数量优势“坐庄”，深度掌控了虚拟货币交易，使这一交易成为洗劫全球财富的新工具，其基本特征仍然是暴涨暴跌：不把对手盘打爆仓，绝不回头。因此，虚拟货币交易实际已成为全球投资者与美元霸权血拼的第三赌场。

2. 规则绑定：美国利用其在全球金融监管领域的话语权，以推动虚拟货币“合规化”进程为名，强制要求全球虚拟货币交易所遵守“美元结算+信息披露+反洗钱”规则，本质是将虚拟货币纳入美元主导的支付清算体系，使其成为美元的“数字附庸”而非替代者；

3. 技术标准主导：美国科技巨头与金融资本联合主导区块链底层技术标准的制定，通过专利布局、代码控制等方式，掌握虚拟货币的技术演进方向，确保其难以突破美元体系。

四、剥削机制：美元霸权与白银货币垄断制度一脉相承

（一）美元向各国的初始铺垫

美国财政部向美联储借钱开销，是美元流向各国的主要初始路径，逻辑链条是：“美国财政部借钱→美联储印刷美元→财政、军费开销→进口商品（窃取铸币税）→美元流向各国”。这一机制，使美国的贸易逆差逐步走高和美联储持有的国债数额逐年增长，也使美元得以成为了各国的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

（二）美元霸权的金融收割机制

美国金融统治阶级传承了欧洲金融资本的剥削基因，在长期实践中产生了股市、汇市、黄金、比特币、美元稳定币、资本自由流动等多种金融工具、金融技术和金融

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剥削技术“**核心算法**”，构建起“国际资本流动、黄金交易、虚拟货币交易”等赌场，用于操纵全球金融市场，持续获取巨额投机收益：不断从国外赚回大把美元。然后，他们又把这些美元主要用于购买全球资产和美国国债，不断堆积金融资本，同时使美元又流回到各国。由此形成了以下两条美元跨国循环路径：

1. 购买全球资产路径：“金融收割→夺回美元→购买各国资产（窃取铸币税）→美元流回各国→金融收割→再夺回美元”，如此循环往复。在这一模式下，各国大量优质资产被逐步收入美国金融资本囊中。

2. 购买美国国债路径：“金融收割→夺回美元→购买美国国债→财政、军费开销→进口商品（窃取铸币税）→美元流回各国→金融收割→夺回美元”，如此循环往复。在这一模式下，美国的国债数额越垒越高，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美军全球扩张获得了持续财力支撑。

（三）与白银货币垄断制度一脉相承

美元霸权窃取全球铸币税，是对白银货币垄断制度的一脉相承，详见下表。

两种剥削形式对比表

维度	白银货币垄断制度	美元霸权
核心基础	欧洲金融资本通过走私白银, 推动白银在中国主币化	美元霸权通过国际条约等多种措施, 推动美元成为各国储备货币
首轮铸币税	向中国发行白银货币→套取中国商品（窃取铸币税）	印刷美元→进口他国商品、占有股权债权等核心资产（窃取铸币税）
二轮铸币税	向中国走私鸦片、战争索赔→夺回白银→套取中国商品（窃取第二轮铸币税）	操纵全球金融市场→夺回美元→用于进口他国商品、占有股权债权等核心资产（窃取第二轮铸币税）

从上表可知，美元霸权与白银货币垄断制度的核心差异仅在于掠夺工具不同，而剥削机制则完全一致：都是以近乎零成本的货币符号，换取他国真实财富，将铸币税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垄断者手中。其逻辑链条可简化为：“印刷美元→垄断全球底层货币供给→套取全球商品与服务（窃取首轮铸币税，奠定美国中上阶层物质基础）→操纵全球金融市场→夺回美元→再用于投资或进口（窃取第二轮铸币税）→持续累积金融资本（国债、国外资产、黄金等）”。这是美元霸权对其他国家实施的长期性和根本性剥削机制。并且，铸币税的形式早已不再局限于普通商品，还广泛延伸到了被掠夺国的股权、债权等金融资本领域。例如，现在非西方国家的优质企业纷纷到美国上市融资，支撑起美国股市全球第一，还接受美国资本进入本国股市、汇市炒作等等。

以上剥削机制构成了美元霸权的强大畸形能力。假若任由这一霸权长期发展下去，例如再来一个明清两代那样的三百年，最终结果将是美国金融统治阶级攫取全球绝大部分财富，而其他国家的人民将如同晚清那样一贫如洗。

五、优势加持：人口发展优势与军事霸权的反向支持

美元霸权之所以很难打破，不仅在于其构建了层层递进的金融体系、形成了全球经济的路径依赖，还在于美国凭借人口发展畸形优势和军事霸权优势加持。这两大优势，让美元霸权拥有了自我修复、自我强化的能力，即便面临经济危机、全球质疑，也能通过优势加持维持霸权地位，让想要挣脱枷锁的国家望而却步。

（一）人口发展优势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削弱国家实力的核心难题。这一困境的实质是国家的人力资本在不断萎缩。若任由这一趋势长期发展下去，例如百年后再看，很容易重蹈中国明清两代人力资本枯竭的覆辙。

然而，在这一大背景下，美国却拥有独特的人口发展畸形优势：一方面，美国部分州推行禁止堕胎的人口政策，从法律层面托底生育率；另一方面，美国作为最典型的移民国家，它可以通过制定宽松的移民政策，不断从全球吸纳优质劳动力和高端人才，填补其生育与人才缺口。这两大措施相结合，让美国能够在全球生育衰退中独善其身，维持人口数量的稳定性与人力资本的优质供给。

这一人口发展优势让美元霸权拥有了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即便美国经济出现短期波动，也能通过人口与人才的持续输入实现自我修复。

（二）军事霸权的反向支持

美元霸权支持了美国军事霸权；没有这个财力支持，军事霸权必然熄火。反过来，这个军事霸权常常耀武扬威，反向支持和巩固了美元霸权。二者共同作用，支撑起了美国的政治霸权，让它可以任意干涉别国内政、频繁挑起地缘冲突。

这样就形成了“美元霸权→军事霸权→经济霸权→政治霸权→更稳固的美元霸权”循环，其实质是以美元霸权为核心支撑，集金融、军事、经济、政治于一体的复合型国家霸权主义，本质是近代史上欧洲殖民扩张思维的现代翻版。

六、人类铁枷锁：美元霸权的七大优势和各国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锁死效应

目前美元霸权拥有七大显著优势：（1）充当各国储备货币（外汇储备），这是根基优势；（2）畸形人口发展优势，这是长期支撑；（3）持续数百年累积的剥削技术“核心算法”，这是能力优势；（4）黄金储备全球第一，并且遥遥领先，这是资本优势；（5）掌控两大国际金融机构，这是权力优势；（6）军事霸权，这是暴力优势；（7）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这是话语优势。这些优势，使美元霸权成为一道外壳坚硬、很难打破的铁枷锁，牢牢地套在了人类身上，已成为现代文明困境和桎梏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乱源。

美元霸权之所以成为人类铁枷锁，还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对全球经济社会

发展已造成系统性和根本性危害，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其二，它很难被打破，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其三，各国在现行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框架下，需要不断增加出口、买入美元外汇来发行本币，以及需要长期持有外汇储备来维持本币供给的稳定，形成了一个自我锁死的制度机制，使打破美元霸权成为制度性不可能，这一点鲜为人知，是本文的观点。这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最大制度性困境。因此，在现行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框架内，其他国家实际已无法与美元霸权展开竞争，只能成为被掠夺对象，最终将“穷得只剩下美元”，只是掠夺程度和时间先后有所不同。

七、美元霸权悖论：美国人民也是受害者

美元霸权通过操纵全球金融市场赚取超额利润，追求金融资本无限增殖，主要表现为不断夺回各国手中的美元。这给美国自己制造了难以化解的结构性悖论：

1. 从收割逻辑看，需要扩大贸易逆差

美国需要不断扩大贸易逆差，以此向全球输出美元，才能为后续金融收割创造条件，形成“进口商品→输出美元→金融收割→再进口商品”的循环运作。但这必然压制其国内生产，导致制造业长期空心化，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的再生产能力与竞争力，进而引发民生凋敝、社会矛盾激化。

2. 从发展逻辑看，需要缩减贸易逆差

美国若要修复国内经济、推动再工业化，就必须大幅缩减贸易逆差。但这会直接引发全球“美元荒”，使美元霸权无处收割；同时也会倒逼各国加速寻找美元替代方案，动摇美元霸权。

这就形成了美元霸权的“二选一”困境：美国无法同时拥有霸权地位和健康的国内经济。因此，美国金融统治阶级需要频频发动战争来不断向外转移其国内矛盾，同时巩固在全球的美元霸权地位，一石二鸟。由此可见，美元霸权的核心受益者只是美国金融统治阶级而不是美国人民。美国普通民众与世界各国人民一样，都是美元霸权的共同受害者。这表明，瓦解美元霸权不是与美国的对抗，而是与美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当美国人民认识到霸权悖论的真相，他们将成为推动变革的重要力量。

第七章 用“铸币税流失导致人力资本枯竭”回应经典学术议题

长期以来，针对“李约瑟之谜”“近代大分流”“全球经济中心转移之谜”“非西方世界现代化困境”等经典学术议题，学界分析多停留在制度、技术、地理、文化等表层因素，始终缺乏统一且触及本质的解释框架。本文以中国明清两代三百年白银铸币税流失为历史铁证，为四大经典议题提出全新的解释框架，用逻辑链条表述为：

“铸币税流失→物质资本被掏空→生育与教育双重坍塌→人力资本枯竭”。这一链条

揭示了四大议题的本质——它们并非彼此孤立的学术谜题，而是“铸币税流失导致人力资本枯竭”这一根本规律在不同时空维度的具体表现。

一、破解李约瑟之谜：人力资本枯竭让工业革命失去核心根基

李约瑟之谜，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 1954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经典学术命题：为何中国在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科技与经济长期领先世界，却未能像西方那样在近代自发催生工业革命，反而逐步落后于西方。李约瑟本人在 1994 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2009 年与白求恩、斯诺同列“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针对这一命题，过往解释多归因于封建制度束缚、重农抑商政策、闭关锁国等，但这些均未触及根本。

（一）工业革命的真正前提条件：人力资本充足

工业革命绝非单纯的技术突破，其背后是“三大基础”支持：物质资本（工厂、机器）、市场基础（消费需求）、人力资本（科技人才与技术工人）。其中，人力资本是前提条件。没有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无法创造，市场基础建不起来，技术进步无从谈起。

唐宋时期，中国凭借发达的手工业技术和商品经济，本已具备向近代工业转型的潜在条件。然而，欧洲金融资本对明清两代长期铸币税的系统性掠夺，最终将中国推向了人力资本枯竭的深渊。

（二）终极答案：铸币税流失导致人力资本枯竭，使国家失去发展根基

人力资本的培育，依赖两大核心环节：一是生育，二是教育。这两大环节都需要持续的物质投入，而铸币税的持续流失，恰好切断了这一投入来源，导致民生长期失去基本保障，使人均寿命极低，表明孩子夭折率高、青壮劳动力少，并且基本上都是文盲。

正是这一数量和质的双重丧失，使明清两代失去了国家发展根基，无法催生工业革命。这说明，工业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在中国，不是因为“东方专制主义”或“儒家文化束缚”，而是因为中国被欧洲金融资本的系统性掠夺掏空了发展根基。因此，人力资本枯竭，才是问题的终极答案。

二、解释近代大分流：人力资本的此消彼长造成中西方发展分野

近代大分流，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彭慕兰在 2000 出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提出的核心学术命题：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与中国，为何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社会转型上出现根本性分野，形成“西方领先、东方滞后”的全球发展格局。这一命题打破了传统“西方中心论”认知，引发全球史学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激烈讨论。学界虽有“地理禀赋差异”“煤炭资源分布”“海外殖民地支撑”等解释，但均未触及本质。

（一）被颠倒的因果：西方崛起并非源于其自身优势

近代大分流的本质，并非中西之间存在天然的发展差异，也非欧洲拥有所谓的“先天优势”，而是铸币税掠夺导致的人力资本此消彼长，让中西方发展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轨道。

对欧洲而言：从中国窃取的铸币税，不仅转化为工业革命的物质资本，更通过私人资本投入、王室拨款等多种途径，大量用于建设学校、创办科研机构，培养出大批近代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使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成为技术革新和工业革命的核心支撑。同时，人力资本提升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和消费市场扩张，形成“人才培养→技术革新→经济发展→更多人才投入”的良性循环。

对中国而言：三百年铸币税流失最终导致人力资本枯竭——科技研发无人才、生产发展无劳动力、市场扩张无消费力，整个社会陷入发展停滞。当欧洲借助优质人力资本开启工业革命、步入近代工业文明时，中国却因人力资本枯竭，始终停留在传统农业文明阶段。

（二）核心答案：人力资本的反向运动决定了发展分野

近代大分流的本质，是一场人力资本的“反向运动”：中国因铸币税被掠夺，遭遇了人力资本枯竭；西方通过掠夺中国铸币税，实现了人力资本的跨越式积累。

正是这一“此消彼长”的人力资本反向运动，从根本上决定了中西方发展的根本性分野。因此，欧洲的崛起，不是“制度优越”的结果，而是建立在对中国人力资本掠夺的基础之上；明清两代的衰落，也不是“文明劣等”的证明，而是铸币税被窃取后人力资本枯竭的必然结局。

三、回应全球经济中心转移之谜：人力资本转移带动经济中心转移

全球经济中心转移之谜，是由弗兰克（1998）、彭慕兰（2000）、麦迪森（2001）等学者在世界经济史与全球史研究中逐步凝练形成的经典学术议题：全球经济中心为何从古代中国（唐宋时期）逐步转移至近代欧洲（荷兰、英国），并在 20 世纪进一步转移至现代美国。针对这一命题，学界多从技术革命、制度创新、地缘政治等维度解释，但均未揭示其核心动力。

（一）被忽视的规律：经济中心随人力资本集聚地转移

全球经济中心转移的核心逻辑是全球铸币税掠夺主导权的转移，以及由此引发人力资本集聚与枯竭的反向运动。谁掌握了铸币税掠夺的主导权，谁就能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提升，成为人才与资本的集聚中心，最终成为全球经济中心；而被掠夺的一方，会因铸币税流失导致人力资本枯竭，失去发展根基，最终让出经济中心的地位。

（二）两次转移，同一逻辑

第一次转移：从中国到欧洲。唐宋时期，中国牢牢掌控货币发行权，铸币税收益

服务于国内发展，生育与教育体系得以维系，人力资本持续提升，成为全球人才、技术与财富的集聚中心，自然成为全球经济核心。16 世纪后，欧洲金融资本构建白银货币垄断制度，通过掠夺中国铸币税完成资本与人才的双重积累，使欧洲人力资本得以快速提升，逐步取代中国成为近代全球经济中心。

第二次转移：从欧洲到美国。一战、二战前夕，欧洲核心金融资本为躲避战祸，将剥削家底搬到美国，使美国实现了对全球的铸币税长期掠夺和人力资本的跨越式提升，得以逐步取代欧洲成为现代全球经济中心。

（三）核心答案：人力资本随铸币税主导权转移，使经济中心转移

每一次经济中心的转移，都伴随着铸币税主导权的易手，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力资本随迁。因此，全球经济中心转移的本质，是人力资本核心集聚地的转移。这一结论打破了西方将经济中心转移归因于“制度优势”“文明优越”的虚假叙事，揭示了全球经济变迁的底层逻辑。

四、阐释非西方世界现代化困境：人力资本衰竭成为核心桎梏

非西方世界现代化困境，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学者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近代以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非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何普遍陷入困境。针对这一命题，过往解释聚焦于西方殖民统治、“中心—边缘”结构、文明差异等，均未触及根本。

（一）殖民时代：货币主权直接丧失，人力资本被系统性摧毁

西方殖民者在殖民过程中，通过强制推行西方货币体系、垄断货币发行权，铸币税被西方殖民者直接掠夺，转化为宗主国的学校、实验室和工业资本。

更致命的是，殖民掠夺不仅掏空物质资本，更直接摧毁了人力资本再生产的基础：强制劳动导致人口损耗，资源掠夺引发民生赤贫，教育投入归零导致全民文盲。数百年的殖民统治，使非西方世界的人力资本被系统性摧毁。

（二）后殖民时代：货币主权间接让渡，人力资本持续失血

二战后，非西方世界虽实现民族独立，却因经济落后、金融体系不健全，不得不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它们以西方货币为锚定发行本币，大量持有西方外汇储备，实际是铸币税持续被西方掠夺。这一过程与明清中国“出口商品换取白银货币符号”高度相似：非西方世界失去核心社会经济产出，仅获得西方货币符号。持续的铸币税流失，导致这些国家始终无法积累现代化所需的物质资本，陷入“出口原料→换取货币符号→财富流失→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

（三）核心答案：人力资本枯竭是非西方世界现代化困境的根源

非西方世界现代化困境的本质，是货币主权旁落引发的连锁效应，最终导致人力资本彻底枯竭。具体逻辑按以下层层递进：

1. 物质资本匮乏：优质商品需要出口，换回美元货币符号，实质是铸币税流失；
2. 市场消费衰竭：民生贫困导致内需萎缩，使经济发展停滞；
3. 教育投入缺失：无力培养科技人才、技术工人，形成“技术依赖型”发展模式；
4. 人才持续外流：优质人才流向西方，进一步加剧人力资本枯竭。

当人力资本的“造血功能”被摧毁，现代化便失去了根本动力。这说明，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困境，并非自身发展能力不足，而是西方主导的铸币税掠夺导致的人力资本枯竭，成为无法跨越的历史障碍。

五、核心论断与统一答案：人力资本是国家第一资本

（一）人力资本枯竭导致文明衰落

将四大议题串联起来，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清晰呈现：

四大经典学术议题答案列表

议题	核心问题	传统解释	本文答案
李约瑟之谜	中国为何未能自发催生工业革命？	制度、文化、政策	人力资本枯竭→工业革命三大基础全失
近代大分流	中西为何出现发展分野？	地理、煤炭、殖民地	人力资本此消彼长→中国枯竭、欧洲增长
全球经济中心转移	全球经济中心为何从中国到欧洲再到美国？	技术革命、制度创新	人力资本随铸币税主导权转移
非西方世界现代化困境	为何普遍陷入发展困境？	殖民统治、依附结构	铸币税长期流失，人力资本枯竭

四大经典学术议题，看似领域不同、时空各异，实则指向同一个核心根源：货币主权旁落导致的铸币税流失，引发人力资本枯竭，最终使文明衰落。

（二）人力资本是国家第一资本

这是本文对四大议题给出的统一答案，也是本文得出的核心论断和理论升华。有以下四重递进的含义：

1. 本体论层面（发展之本）：一切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归根结底都是人力资本的物化形态。任何文明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培育与延续，物质财富的积累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 机制论层面（权柄之枢）：铸币税在哪里，人力资本就在哪里；谁掌握了铸币税的归属，谁就掌握了人力资本的命脉。
3. 价值论层面（制度之尺）：任何制度的优劣，最终要看其是否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培育与延续。制度若能为生育减负、为教育赋能，则国家兴盛；若让生育劳动无补偿、让教育投入无着落，则国家衰落。

4. 方法论层面（历史之鉴）：当一国的货币主权旁落、铸币税持续流失，其人力资本便失去了物质滋养的源泉，无论曾经多么辉煌的文明，都将在历史转折点上黯然失色；反之，掌握货币主权、将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的国家，终将因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而走向复兴。

（三）人力资本定律（规律提炼）

定律：一国发展取决于人力资本，而铸币税归属决定人力资本。

具体内涵：一国长期发展的上限与下限，最终取决于其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而铸币税的归属，是决定人力资本兴衰的根本制度变量。

以上论断与定律是一体两面、相互支撑的关系。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抽象描述，也是对文明兴衰的客观总结。它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货币主权是国家主权的基石，人力资本是国家发展的根基。

第八章 瓦解美元霸权的第一步：破除对黄金的迷思及改革方案

长期以来，黄金被视作“价值的最终贮藏”与“信用的终极背书”。这体现了人类对黄金的迷思。2024—2025 年全球黄金价格成倍飙涨，正是这一迷思的直观体现。美国金融统治阶级手握全球第一的黄金储备，既是其掠夺全球财富的历史见证，也是他们继续展开掠夺的现实物质基础，更是在黄金迷思下支撑起全球对美元信心的心理锚点。然而，黄金真有那么重要吗？其实不然。黄金除了开采成本高、可用作装饰品和工业原料外，它其实就是一块普通的金属。

一、黄金的重要性是西方金融统治阶级编造的谎言

欧洲金融资本通过持续三百年掠夺中国铸币税而兑换、积蓄了大量黄金，以此推动英国政府在 1816 年确立以黄金为锚发行纸币，目的是垄断其国内货币发行权、独占铸币税收益；后来欧洲金融资本的主体及其大量黄金搬迁到美国后，于 1944 年建立起“美元—黄金”汇兑本位制，目的是垄断各国底层货币发行权、收割全球铸币税，是故伎重演；1971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目的是为了获得赌博工具，是剥削技术的再升级。

如果这一赌博工具能够长期维持下去，那么西方金融统治阶级就能世代利用“天量黄金储备做底+美元货币发行权+黄金定价权+制造市场波动”坐庄、收割全球财富，并且能够牢牢维系起美元霸权地位。其逻辑链条是：“美国黄金最多→美元最可信→美元天然是世界货币”。现在，这一思维逻辑既是人类社会的心理锚点，也构成了美元霸权的脊梁。

以上表明，黄金的重要性不过是西方金融统治阶级编造的一场谎言，也是美元霸权的命门。为了巩固谎言，他们刻意将黄金的“重要性”写入最早的经济学理论与教

材。当一代又一代人在教科书、媒体报道和金融实践中，反复接受“黄金=价值”的定向暗示，黄金便从人为建构的“社会符号”，升华为难以撼动的“心理图腾”，最终成为根深蒂固的人类迷思。

二、从事实与逻辑上对黄金重要性的双重证伪

（一）黄金储备与民生需求完全脱节

在经济现实中，黄金的实际价值远远被高估，其巨额储备反而常常成为民生艰困的真实写照与讽刺。例如据媒体报道，2024年12月8日，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攻入首都大马士革，使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倒台，彼时无数国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而叙利亚中央银行库房中仍存放着26吨黄金，需要三人同时输入密码才能开启库门。这一事实正是货币垄断制度的典型恶果：核心社会经济产出被直接转化为黄金囤积，脱离了民生实际需求，最终导致国家“穷得只剩下黄金”。这与中国明清两代“穷得只剩下白银”的历史悲剧如出一辙。

（二）国家的经济发展依靠人力资本，而非黄金储备多寡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能取得伟大经济成就、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本在于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保障；而在经济层面，则核心依靠新中国成立后的扫盲运动，以及改革开放后逐步健全的国民教育体系，由此带来的人力资本持续增长，而非黄金储备的多少。黄金既不能果腹，也不能御寒，更无法直接转化为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支出，本质上无法真正滋养人力资本和支撑国家发展。

三、黄金迷思导致的双重危害

人类社会对黄金的迷思，从认知、实践两个层面，构筑起阻碍货币制度变革的坚固壁垒：

第一，认知层面，“黄金本位思维”深度固化。受此思维影响，各国制定货币政策时，会本能地寻求黄金这类“物质锚定”，却忽视了货币发行真正值得锚定的核心对象是人的再生产，即人力资本培育。

第二，实践层面，社会资源错配持续加剧。黄金本位思维将各国的资源配置重心引向黄金、外汇等金融资产，而非投入到生育支持核心领域。而美元霸权正是精准利用了这一错误认知，通过掌控天量黄金储备和黄金交易市场，不断“加固”美元信用，巩固其自身霸权地位和继续掠夺全球财富。

以上双重危害充分揭示：黄金迷思绝非无害的认知偏差，而是美元霸权得以持续维系的重要心理与实践支撑。不破除这一迷思，任何货币制度革新都将困于“物质锚定”的思维牢笼，寸步难行。

四、改革方案：建立“储备黄金交易市场”，让黄金成为投资品而非货币锚

破除黄金迷思，核心目标是通过货币制度改革，废除黄金的货币锚定地位，即国家不再通过买入黄金发行货币。但这绝非否定黄金价值，而是要让黄金回归其应有位置：从“货币锚”转变为“投资品”和“民生支持工具”。

本文提出，在生育铸币制度框架内，国家建立“储备黄金交易市场”，把央行的黄金储备以“纸黄金”形式卖给公众，所得款项交给社保部，专项用于生育补助；储备黄金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实物，使用权归国家，并由实际使用单位在依法完善审批手续后从交易系统里按市价购买；通过免税的方式，鼓励黄金生产单位通过这个交易系统向公众销售新生产的黄金，维持储备黄金的代谢稳定。这一改革具有三重意义：

第一，**盘活存量**，支持民生。央行的黄金储备原本取之于民，如今通过市场化运作释放其价值，将收益定向反哺育儿家庭，让沉睡金库中的黄金真正服务于“人的再生产”。

第二，**涵养增量**，夯实根基。新生产的黄金直接进入交易系统，形成“生产→销售→储备稳定”的良性循环，既满足民众投资需求，又持续增强国家战略资源厚度。

第三，**藏富于民**，兼顾安全。纸黄金的推出为公众提供了长期可靠的硬投资品种，满足民众财富保值需求；同时国家保留对黄金实物的集中控制权，确保战略资源在关键时刻可调配、可动用，实现“藏富于民”与“国家掌控”的有机统一。

这一改革，将使黄金从“货币锚”蜕变为“投资品”，使其不再是压在人类身上的枷锁，而是滋养人力资本、服务国家发展的实用工具。如此改革后，货币将全面脱离黄金锚定，转而与“人的再生产”锚定，使国与国之间不再比拼黄金数量。其本质是用“人本位”取代了“金本位”。这将使美国官方金库和华尔街金融资本私库里的黄金从“霸权支柱”蜕变为“普通资产”。显然，这将打断美元霸权的脊梁、封堵其命门，走出瓦解美元霸权的坚定第一步。

第九章 用“生育铸币制度”与美元霸权展开货币制度竞争

国家采取生育补助的唯一方式，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就是建立起了生育铸币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目标是让铸币税直达育儿家庭，用于人的再生产，以此恢复正常的生育率、补齐消费短板和推动充分就业，形成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的稳定锚。这一改革，完全离开了美元霸权所把持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赛道，将以换道超车的方式，最终瓦解美元霸权。

一、生育铸币制度的总体构想

1. 在货币一级市场上，只允许央行按月发行货币，全部通过国家社保部转发给广大育儿家庭用于生育补助，存于商业银行，形成人民的“原始存款”；央行每年发行的货币总额可在上年末已发行货币总量的 5%左右考虑，形成国家的经济增长；国家禁止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包括商业银行发行货币，禁止一切形式的虚拟货币和代币，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

2. 人民有多少原始存款，商业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就最多只能放出去多少贷款，并通过央行大幅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到 50%来实现。与此配套，央行补充发行货币，交给社保部，分散存于各大商业银行，用于填补各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差额；同时，把央行对各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全部转交给社保部，转化为社保部在各商业银行的存款。

社保部把收到的以上两项巨额存款，首先用于一举清偿各级政府的历史债务，剩余部分用于建立“全民普惠型养老基金”，作为全社会的长期战略储备。

此项配套改革措施的实质，是释放过去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所累积和隐藏的铸币税红利，用于国家长期发展。这样改革后，各级政府将无债一身轻，能够轻装上阵，更好地服务于人民。

3. 把央行的外汇储备资产划转给社保部，但仍由外汇管理局实施专业管理，通过技术措施逐步变现后，用于生育补助。

4. 国家持续发放生育补助后，人民就有了强大的消费能力和真实的消费需求，将打通国内大循环，实现产销两旺。这样，国家不需要再搞净出口，将主动通过汇率调节来追求国际贸易收支平衡；也不需要再减税，反而可以向高收入者和高消费加税，促进社会再分配，用于保障民生。

5. 生育补助的发放时段大致是 0 到 22 岁（大学本科毕业止），涵盖孩子的主要成长阶段；国家实行夫妇 2 孩补助基本政策，保障人口更替的基础需要；并根据当年人口形势，可选择性地补助优先申请的夫妇新生 3—4 孩；不分地区和民族，每孩补助标准相同，体现对每个新生命的平等尊重。如果国家需要缩减人口，应实行 2 孩补助政策，使人口长期平稳回落到目标值，而不对经济发展产生冲击。

以上改革措施有明确的货币发行方式、时间、数量和受益对象，标志着货币发行权实际已回归家庭部门，从此银行部门不再享有货币发行权。

二、生育铸币制度的可行性验证和终极目标

（一）按生育补助方式发行货币

2024 年我国 M2 货币总额 313.53 万亿元，比上年增加了 21.26 万亿元。假定改按生育补助的方式发行货币：

我国 22 岁以下的孩子大约有 3 亿人，按现在的物价水平，每人每月发放生育补助 3000 元（相当于一个成人的低水平打工月收入），全年央行需要发行货币 10.8 万亿

元用于生育补助；商业银行按 50%的存款准备金率，再扣除周转资金的影响因素后，假定实际顶格放贷 0.8 倍出去，合计可以形成 M2 货币总额 19.44 万亿元(=10.8×180%)。此金额与 2024 年 M2 货币实际增加额 21.26 万亿元大体相当，具有可行性。

2025 年我国 M2 货币总额 340.2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26.76 万亿元。若把这些货币用于生育补助，绰绰有余。

（二）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到 50%

2023 年我国银行部门的贷款余额 242.24 万亿元，对应有存款货币 242.24 万亿元。为了方便理解，以下按此数据简单计算，不考虑其他数据。国家把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 50%，需要央行补充发行 242.24 万亿元的货币交给社保部（=242.24÷50%—242.24），分散存于各大商业银行，用于补齐各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差额。这样，在全国商业银行的汇总资产负债表上，资产和负债将分别达到 484.48 万亿元，详见下表：

全国所有商业银行汇总资产负债简表（金额单位：万亿元）

资产	金额	负债	金额
存放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	242.24	储蓄存款：原始存款（社保部新增）	242.24
发放贷款（原贷款户不变）	242.24	储蓄存款：次生存款（原存款户不变）	242.24
资产合计	484.48	负债合计	484.48

从上表可知，全国商业银行有一半资产将以存款准备金形式存放在中央银行里，对应负债方的人民“原始存款”；另一半资产是商业银行原来的“发放贷款”余额，对应负债方原存款户的“次生存款”。其经济含义是：央行通过生育补助方式发行货币给育儿家庭（由社保部中转），形成人民的原始存款；商业银行作为货币中介机构，把原始存款最多放贷 1 倍出去，形成“次生存款”。

社保部得到的这 242.24 万亿元资金，实际是货币改革释放出的首批红利，可用于**一举还清各级政府的历史债务**（据财政部数据，截至 2023 年末，中国政府债务余额为 70 万亿元）；还会有大量剩余，可用于建立“全民普惠型养老基金”，**优先用于发放退休农民工的养老金**。这将直接推动社会消费与就业，同时减轻其子女的供养压力，从而间接支持年轻人婚育。然后，在现行社保缴费实行“费改税”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覆盖全民的“普惠型养老金制度”，让每个人到达一定年龄后都能领取到养老金。这实质上是以扩大社会消费的方式，为年轻人创造就业岗位——老人有钱花，年轻人就有活干。

以上改革红利的资金暂时全部集中于社保部的存款账户上，国家可以有计划地稳妥推进改革，逐步使用这批资金，因此不会对经济和金融秩序造成任何冲击。鉴于当前通货紧缩和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比较严峻，国家进行生育铸币制度改革，只会

激活市场消费、推动就业、支持生育和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不会带来通货膨胀。

（三）生育铸币制度的终极目标

1. 实现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
2. 激活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建成真正的发达国家。

三、生育铸币制度的主要收益

国家实施生育铸币制度改革，将收获以下重大成果，为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底层制度支撑：

1. 让货币主权回归广大人民，大幅降低人民的资产负债率，全面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2. 大幅提高“人口消费力”，补齐消费短板，人民不再销售、就业和婚育困难；
3. 把结婚和生育率提高到正常水平，扎实培育人力资本，实现长期人口均衡发展；
4. 形成货币发行和经济增长的稳定锚，使科技进步与人民福祉完全贴合，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同步推进；
5. 杜绝银行滥发货币，不再通货膨胀；
6. 国家将摆脱对外贸易的依赖，构建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7. 经济形势将全面好转，有效化解金融系统的坏账和挤兑风险；
8. 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成消费强国，产生虹吸效应，最终破解美元霸权。

四、我国具有率先建立生育铸币制度的独特优势

我国率先建立生育铸币制度，绝非凭空构想，而是建立在中国独有的综合优势之上。这些优势相互支撑，构成了制度落地的坚实保障：

1. 政治独立与制度自信。我国政治独立，拥有完全自主决定货币政策的能力和权利，能为货币改革提供强大的政治保障。
2. 雄厚基础与科技支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了雄厚的物质财富，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能为货币改革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
3. 战略纵深和坚强后盾。我国拥有幅员辽阔的国土、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能在生育铸币制度下抵御来自外部的任何干扰和冲击。
4.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生育铸币制度的核心导向是“支持家庭生育、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高度契合。

五、用生育铸币制度瓦解美元霸权的核心逻辑

用生育铸币制度瓦解美元霸权，核心并非直接的金融对抗，而是通过跳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框架、重构货币发行底层逻辑、重塑国内经济循环，从根源上抽离美元霸

权的存续基础，以制度创新实现换道超车，推动美元霸权从“全球货币”逐步走向“美国货币”，最终实现霸权的系统性瓦解。其核心逻辑围绕以下五方面展开。

（一）切断美元货币锚定，终结美元的全球底层货币供给垄断

美元霸权的核心根基，是各国银行以买入美元为核心锚定发行本币，使美元成为全球底层货币供给的主导者。生育铸币制度以生育劳动为货币发行的唯一锚定，彻底摒弃美元、黄金等外部锚定，使本币发行和经济发展完全依靠国内人的再生产与人力资本培育，实现货币发行权的完全自主可控。

当越来越多国家采用这一制度，把货币发行与美元脱钩，就能使美元垄断全球底层货币供给的基础被彻底切断，失去通过货币锚定窃取各国铸币税的核心渠道。

（二）重构内生经济循环，摆脱对美元贸易结算的刚性依赖

美元霸权的重要支撑，是各国形成了“出口商品换美元→用美元做贸易结算/外汇储备→再用美元进口商品”的外生经济循环。各国为维持贸易与金融稳定，不得不被动持有美元，成为美元霸权的“接盘者”。生育铸币制度通过铸币税直达育儿家庭，激活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推动各国经济循环从“外需驱动、美元绑定”转向“内需主导、自主循环”。这样，国内生产体系围绕民生需求布局，国际贸易以“互利共赢、货币自主”为原则，可通过本币结算、双边清算等方式摆脱美元结算依赖。

当全球经济循环不再以美元为核心枢纽，美元的贸易结算霸权将逐步消解，其通过结算体系操控全球贸易、转嫁经济风险的能力大幅弱化。

（三）打掉铸币税掠夺，使美元霸权失去物质与军事支撑

美元霸权的存续，依托铸币税掠夺的物质支撑与军事霸权的暴力支撑，形成双向强化：通过窃取全球铸币税获得巨额财富，支撑美军全球霸权；再以美军霸权为后盾，巩固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生育铸币制度从两大维度消解这一支撑：一是各国摆脱美元锚定与结算依赖后，美元铸币税掠夺的范围与规模将大幅萎缩，难以继续支撑美军的庞大军事开支，使美军霸权因财力枯竭逐步衰落；二是生育铸币制度推动各国人力资本提升、经济自主发展，形成多极化的全球经济格局，各国综合实力提升，有能力抵御美国的军事威慑与金融打压，使美元霸权失去暴力支撑。

以上两方面消解，让美元霸权陷入“财力不足、威慑失效”的双重困境，难以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

（四）凝聚全球南方国家共识，形成反制美元霸权的集体力量

美元霸权的掠夺性，目前对全球南方国家的伤害最为深重，这些国家长期陷入“出口资源换美元→美元外流→货币主权旁落→经济发展停滞”的恶性循环，是反制美元霸权的核心力量。生育铸币制度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摆脱美元依附、实现自主发展的可行路径：无需依赖美元外汇储备，通过激活国内生育消费与人力资本，实现经济内生增长；无需接受美国主导的不平等金融规则，可依托自身货币主权构建自主的金

融体系。

中国以生育铸币制度为核心纽带，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深度合作，推动本币结算、货币互信、金融互助，凝聚起反制美元霸权的集体共识与力量。当全球南方国家形成统一的反制合力，美元霸权的全球影响力将被大幅压缩，无法再凭借单边力量操控全球经济秩序。

（五）以普惠共生的民本精神，对冲唯我独尊的霸道精神

美元霸权的底层逻辑，是唯我独尊的霸道精神。它以“美国优先”为信条，将自身金融利益凌驾于全球共同发展之上；通过美元垄断、金融制裁与军事威慑，构筑起“顺者昌、逆者亡”的单极秩序。这套逻辑植根于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与人类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追求背道而驰。

生育铸币制度所承载的，是以人民为根本、以共生为路径的民本精神。它不是将货币发行视为金融资本增殖的工具，而是使其回归本源——服务人的再生产，反哺生育劳动，滋养每一个普通家庭。这一制度坚守货币主权平等、发展机会共享、全球互利共赢，不输出模式，不搞零和，不谋求霸权。

中国率先践行这一制度，既是为了解决自身人口与发展的深层矛盾，更是以实践作出示范：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必建立在对他国的剥削之上；一种货币的信用，不必依靠武力与制裁来维系。当普惠共生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制度选择，当各国人民都能从本国货币发行中获益而非受损，美元霸道精神所依存的依附结构将自然松动，其价值理念也将逐步失去全球认同。

最终，取代霸权的不是另一种霸权，而是一种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文明范式。这正是民本精神的要义所在：以自身的发展实践，为人类探索一条超越霸权、走向共生的新路。

综合上述，生育铸币制度瓦解美元霸权的核心，是以制度创新打破旧有格局、以价值引领重塑全球秩序，不与美元霸权在其主导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框架内竞争，而是通过构建更符合人类发展需求的新型货币制度、经济循环与价值理念，让美元霸权因失去存续基础、制度支撑、力量依托与价值共识，逐步走向瓦解。这一过程是和平的、渐进的，是通过制度替代、格局重塑、力量重构、价值超越实现的，最终推动全球货币体系与经济治理体系向公平、普惠、多元共治的方向转型。

六、用生育铸币制度开启“生育文明”新纪元

生育铸币制度的深远意义，远超破解生育衰退、瓦解美元霸权的现实目标，其核心逻辑是推动人类文明完成根本性转向——从工业文明“物的再生产优先、资本增殖至上”的异化逻辑，回归“人的再生产为核心、生命繁衍为根基”的文明本源，彻底摒弃美元霸权主导的“掠夺共生”模式。它以铸币税反哺生育劳动，让货币制度服务

于人类根本需求，使经济发展、人口繁衍与文明进步形成正向互促，为破解全球生育衰退、债务困境、霸权冲突提供了根本性方案。

这一制度以“公平、普惠、共生”为核心价值，推动全球治理从“资本中心”转向“人民为中心”、从“霸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它既为各国提供了摆脱美元霸权依附、实现自主发展的制度选择，更能凝聚全球共识，共谋人类和平与发展。这样货币发行锚定生育劳动、发展成果惠及育儿家庭，人类社会便将告别持续数千年、以经济掠夺为实质、以垄断铸币为核心、以武力争夺和制度控制为手段的“暴力文明”，迈入以生育为基石、以人民幸福为目标、以共生共荣为方向的“生育文明”新纪元。

综合上述，我国率先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就能引领人类文明新方向，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成真正的发达国家。这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要义。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为破解全球债务高企和生育衰退的现代文明困境，本文从人的再生产、劳动力商品、生育劳动等基础理论创新出发，提出“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理论命题，以此穿透了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构筑的理论迷障，发现了一段被遮蔽和扭曲的重大历史真相：16—19 世纪，欧洲金融资本以近乎零成本的美洲白银为工具，持续三百年窃取中国铸币税，导致明清两代国运衰竭；进一步研究发现，欧洲金融资本的主体在一战、二战前夕迁徙至美国，将其剥削逻辑迭代升级为美元霸权，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掠夺各国铸币税，是现代文明困境的核心乱源。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提炼出贯穿古今的客观历史规律，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与美元霸权展开差异化的“货币制度竞争”。现将研究结论从理论发现、历史真相、历史规律、制度创新、历史总纲五个维度总结如下。

一、理论发现：被遮蔽的经济学真理

本文通过对铸币税本质的追问，揭示了三个长期被西方主流经济学遮蔽的核心命题。这些命题并非凭空杜撰，而是人类社会的客观事实和真理。只因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便服务于西方金融统治阶级的剥削利益，通过构建“货币中性论”“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等理论迷障，刻意将货币发行与价值创造的本源割裂，使这些真理在数百年间隐而不彰。

（一）劳动者是一切财富的创造主体，劳动力商品是现实世界的核心价值

本文对劳动力商品的界定是：劳动者以其体力、智力和技能为基础，生产物质文化商品和提供人力服务的能力。其中，体力的价值贡献极其有限，例如严重智障者虽有充沛体力却无法创造任何商品价值；劳动力商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劳动者通过学习与实践继承和发扬科学技术所形成的智力与技能。人类社会的所有科学技术，都是劳

动者创造的，是历代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结晶，它不会随着个体生命的消逝而消失，而是在代际传承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文明进步的阶梯；科学技术并不真正独立存在，需要由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来不断地继承和发扬，否则就会失传。

在现实世界中，人类社会的所有财富，归根结底都是劳动者体力、智力和技能的物化形态。无论是古代的丝绸瓷器、近代的机器工厂，还是现代的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其背后无不凝结着劳动者的生产技能、知识积累与创造性劳动。这些财富形态虽然千差万别，却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寿命周期，都会在使用中损耗、折旧或过时，都需要劳动者通过持续的社会再生产去更新、创造和复现。因此，劳动者是一切财富的创造主体，而劳动力商品是现实世界的核心价值。

（二）生育劳动是经济循环的真正起点，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价值，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本源和根基

劳动者和劳动力商品不会凭空产生。每一个具备劳动能力的个体，都需要父母原生家庭长达二十年左右的孕育、抚养、教育和技能培养，才能从嗷嗷待哺的婴儿成长为社会的合格劳动者。这一过程所包含的家庭全部直接与间接人力投入——从怀孕分娩的生理付出，到日常照料的精力消耗；从赚钱养家的物质保障，到缴纳税款支持公共教育的社会贡献——构成了本文所定义的生育劳动。

生育劳动创造了劳动力商品的“**源生智能**”：以生命为基础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其中前者是智力，后者是技能。正是这种源生智能，赋予劳动者以强烈的欲望和无穷的想象力，进而产生强大的发明、创造与革新能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源动力。没有生育劳动，世界将会一片荒芜；没有人的再生产，就没有经济活动的主体。因此，人类社会的经济循环是：“生育劳动→人口繁衍→劳动力商品→生产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实现金融资本无限增殖或反哺生育劳动”。其中，生育劳动是经济循环的真正起点，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价值，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本源和根基。

（三）铸币税以货币发行者占有的各类商品或金融资产为形式表现，是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是家庭部门生育劳动的最终成果

传统理论认为，铸币税是货币面值超过其制造成本的差额。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1）货币发行者把货币制造出来交给劳动者的同时，换得其生产成果，实现了对铸币税的占有，因此铸币税并非以货币形式表现，而是以占有的丝绸、瓷器、服务、外汇、黄金、股权、债权等商品或金融资产为形式表现；（2）由于一切财富归根结底都是劳动者创造的，所以铸币税实际是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和价值体现；（3）由于劳动者来自家庭部门长达 20 年左右的生育，所以铸币税的本质，是家庭部门生育劳动价值的最终成果。用公式表述为：

铸币税=货币面值—铸币成本（传统计算公式）

铸币税=丝绸、瓷器、服务、黄金、外汇、股权、债权等（表现形式）

铸币税=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价值来源）

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价值本源）

然而，人类社会自从奴隶社会以来，就建立起了货币垄断制度，使货币发行脱离了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价值本源，使生育劳动沦为无价值活动，导致社会消费能力不足和生育困难，最终使国家陷入周期性文明衰退。

二、历史真相：被遮蔽和扭曲的中华民族悲惨苦难史

基于以上铸币税理论，本文从中国白银货币史中发掘出 16—19 世纪欧洲金融资本长期掠夺中国铸币税的悲惨历史。只因西方中心论史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同出一源，共同服务于西方金融统治阶级的剥削利益，而将这一铸币税掠夺史粉饰为“自由贸易”与“白银贸易”，使这一历史在“商品交换”的伪装下被完全遮蔽和扭曲。

（一）中国持续三百年“白银铸币税失窃”，导致明清两代国运衰竭

中国自最早的奴隶社会夏朝起建立了“王权货币垄断制度”，历经秦汉、唐宋、元明，已经运行数千年。在这一制度下，王权通过货币发行获得铸币税，主要用于王室、军事、官俸等开销，也用于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和城市建设等民生发展，是国家财政的核心支柱。到明代初年，该货币体系以大明宝钞（纸币）为主、铜钱为辅，官府明定“交易用钞，禁用金银”。

王权货币垄断制度因存在货币发行绕开了家庭部门生育劳动价值本源，造成货币分配失衡和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缺陷，导致了王朝周期性衰落；但它把铸币税用于财政开销和社会发展，与高利贷隔离，不以资本增殖为目标，可以在王朝初期搞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实际蕴含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核心思想，因此造就了汉唐、宋元的经济鼎盛和取得了四大发明的重大科技成就。这与古代欧洲“个人本位”思想主导下，铸币权分散、与高利贷合二为一、追求资本无限增殖的“私有货币制度”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这一根本性差异，使中国经济得以在古代长期遥遥领先于欧洲。

然而自 16 世纪的明代中期开始到 19 世纪初，欧洲金融资本以“白银贸易”为伪装，利用从美洲殖民掠夺的近乎零成本白银，通过先走私、后公开的方式突破中国官方禁银令，持续三百年大规模套取中国丝绸、瓷器、漆器、黄金等核心社会经济产出，其实质是面向中国**发行白银货币**、充当了当时中国的“中央银行”，掠夺中国铸币税，本质是“**超级假币入侵**”。这一过程具有持续性的预谋，是充分利用了当时中国在货币理论认知上的局限，因此应当定性为对中国铸币税的长期窃取。

随着美洲白银走私输入的增加，明代官府被迫逐步放松银禁，从“禁银”转向“认银”，从警觉转向麻木、再到毫无警觉：于 1567 年确立白银为法定流通货币，1581 年通过“一条鞭法”确立白银主币地位。清朝取代明朝后，继续确立白银为主货币，并且不断强化了这一货币制度。

由于中国本土的白银资源禀赋先天不足，所以欧洲金融资本向中国输入白银，很快就垄断了中国货币发行权，其实质是在中国构建起了隐秘的“**白银货币垄断制度**”，摧毁了中国的“王权货币垄断制度”。这一外部冲击，使中国持续三百年掉入“出口优质商品（铸币税）→收取白银货币符号”的巨大陷阱，此为“**首轮铸币税**”流失，最后“**穷得只剩下白银**”——这些白银流入中国后，大量进入极少数官僚、买办和高利贷资本手里被窖藏；官府丧失了货币发行权和庞大的铸币税收入，造成财政根基坍塌；为了维持政权运转，官府不得不对民间展开竭泽而渔的重税盘剥，使明清两代陷入“越征越穷、越穷越征”的恶性循环，导致官府、军队和民众长期处于赤贫困境，使民间卖儿鬻女成为常态、饿殍千里屡见不鲜，造成生育和教育双重塌陷。这一塌陷表现为人均寿命极低（生得多、能成年的少）和基本上都是文盲，使青壮劳动力和科技、经济、管理、军事人才严重短缺。其实质是国家的人力资本枯竭。正是这个原因，使中国经济从唐宋的世界巅峰跌落至明清两代的谷底，**沦为近代史上全球最大经济受害者**，不仅招致清军入关以少胜多的王朝更替，更使晚清错失工业革命机遇和被动挨打，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虽然明清两代存在封建统治制度自身的腐朽与僵化问题，但那只是历史的文明局限性，而持续三百年“白银铸币税失窃”，逐步掏空了中国的物质基础，并且摧毁了中国王朝周期律的内生修复机制，其破坏力远超历史上任何一轮王朝内部的矛盾累积，使明清两代人力资本枯竭，失去了发展根基。这是明清积贫积弱、走向国运衰竭的根本性原因。

此外，西方金融资本及其国家主体在 19 世纪利用鸦片走私和战争索赔工具从中国公开抢走白银，再用来套取中国优质商品，使中国掉入了新的巨大经济陷阱：“实物低价换取白银→白银被抢→再用实物低价换回白银”，形成恶性循环，不断丧失“**第二轮铸币税**”。这使清政府的财政彻底陷入破产状态，使中国从唐宋时期的世界最强国，沦落为穷困潦倒、任人宰割的世界最弱国。这一衰落趋势直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根本扭转。

（二）欧洲金融资本用“白银超级假币”入侵中国完成原始积累，推动了工业革命，并且建立起银行货币垄断制度

明清时期，中国官方自行开采冶炼的白银，虽然数量有限，但经国家许可，铸币税归财政体系所有，属于中国的合法真币；而欧洲金融资本向中国输入的美洲殖民白

银，虽在物理形态上与中国本土白银没有差别，但没有获得中国官方的货币发行授权，并且它以掠夺铸币税为目标，**是典型的假币**。并且这种假币是长期性、大规模、有组织行为，区别于偶发的个体货币造假行为，因此属于**超级假币**。

欧洲金融资本利用白银超级假币套取中国商品，然后在国际市场销售，获取超额利润，再主要兑换为黄金，积累核心资本，逐步完成原始积累。其核心逻辑链条可概括为：“殖民美洲→开采白银→套取中国商品（窃取铸币税）→获得超额利润→兑换黄金→积累核心资本”。这一掠夺过程也推动了欧洲的工业革命，核心逻辑链条是：“窃取中国铸币税→奠定中上阶层物质基础→开办学校→发展教育→科技研究→工业革命”。

欧洲金融资本用假币入侵中国，窃取铸币税，本质上是把中国明清两代变成了欧洲的“**货币殖民地**”：他们不需要付出实质性劳动，只通过造钱就赚得盆满钵满，成为剥削者，使中国家庭部门因生育劳动白白付出，而长期在苦难中挣扎，沦为受害者。

这一长期性的剥削过程，使欧洲金融资本积累了大量黄金，推动了 1816 年英国金本位制的建立，也推动了英国伦敦在 19 世纪初成为世界金融中心。1609 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1844 年英国确立私营英格兰银行为中央银行，这些事件标志着欧洲金融资本在持续性的剥削技术升级中，逐步建立起了中央银行发行纸币（又称高能货币）、商业银行发行存款货币（又称派生货币）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基本格局。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提出“银行印钞能增加生产和收入”理论，这是把银行部门的“金融资本扩张”误认为是实体经济层面的资本积累与社会收入增加。其本质是在主张由银行部门发行货币。该理论被欧洲金融资本奉为圭臬，成为他们构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强大意识形态武器：他们进行广泛宣传，组织专人撰写教材、培养学生和游说政府。最终推动了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合法化进程。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欧洲金融资本掠夺中国白银铸币税的行为，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遮蔽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国富论》为理论源头，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理论前提，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目标，以“货币中性论”“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为核心理论假设，掩盖了货币发行掠夺铸币税的核心事实，在实践中造成了“金融资本无限增殖、民生需求让渡”的结果。这一理论体系诞生于欧洲殖民扩张和长期窃取中国铸币税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它从来就不是一门中立的科学，而是欧洲金融统治阶级通过精心筛选、资助、固化和不断推广，以服务于殖民统治和金融掠夺的理论工具。现在，这一理论体系已成为美元霸权的理论根基，长期为其霸权行为提供理论遮蔽与话语辩护。

也正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系统性遮蔽，使人们根本无法看到明清两代“中国铸币税

失窃”的严重问题，反而将其扭曲为欧洲金融资本的“正当”贸易所得，掩盖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实际经历了持续三百年“铸币税失窃”的悲惨苦难史。

（四）美元霸权继承了欧洲金融资本的衣钵，深深地根植在中华民族近代三百年苦难史中

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北美大陆逐渐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并由欧洲金融资本主导了北美经济发展。1776年，位于北美的欧洲金融资本为了摆脱宗主国的旧秩序束缚、寻找新舞台，而在财力、人力和物力上予以关键支持，推动美国实现独立。这是欧洲金融资本控制了美国，进而塑造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美国从一开始就是欧洲金融资本的工具和宿主，其独立是为了“资本的自由”，而非“人的自由”。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金融资本主体为躲避战祸，将黄金、金融技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书籍、刊物等）及相关人才迁移至美国，形成美国全新的金融统治阶级，使美国从一个区域新兴国家，跃升为世界最强国。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他们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推广到全球，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如今的美元霸权。

美元霸权的根本基础，不在于美国自身有多强大，而是牢牢建立在各国普遍实行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基础之上。在这一制度下，各国银行部门以美元为锚定，通过买入美元发行本币和形成外汇储备。其核心运行机制可概括为：“企业出口商品→收到美元→央行买入美元（形成外汇储备）→发行本币”。这实际是用出口货物换回美元符号，与明清两代出口货物换回白银符号无本质区别，都是**首轮铸币税**流失。

美元霸权传承了欧洲金融资本数百年殖民统治和金融掠夺的剥削基因和技术，不断研究剥削技术的“**核心算法**”，对外宣称为金融工具、金融技术和金融创新，其核心是利用美元发行权带来的资本数量绝对优势“坐庄”，构建起“国际资本流动、黄金交易、虚拟货币交易”等赌场，其终极目标是夺回各国手中的美元，再用来反复窃取各国铸币税；并且铸币税的形式早已不再局限于普通商品，还广泛延伸到了被掠夺国的股权、债权等金融资本领域。这些赌场使各国反复掉入“19世纪西方通过鸦片走私和战争索赔抢劫中国白银”那样的重大经济陷阱：“低价出口商品换取美元→美元被抢→再次低价出口商品换回美元”，形成恶性循环，不断丧失**第二轮铸币税**。这种铸币税的丧失，最终都将以通货膨胀的形式转嫁给国民，形成一贫如洗的民生困境。

综合以上掠夺逻辑，**美元霸权的核心运行机制**可概括为：“印刷美元→垄断全球底层货币供给→套取全球商品与服务（窃取首轮铸币税，奠定美国中上阶层物质基础）→操纵全球金融市场→夺回美元→再用于投资或进口（窃取第二轮铸币税）→持续累积金融资本”。这一机制完全是对白银货币垄断制度的现代翻版，其中美元货币取代了“白银超级假币”，成为全球新的“超级假币”。

黄金除了开采成本高、可用作装饰品和工业原料外，它其实就是一块普通的金属。但它却成为人类社会的“价值最终贮藏”与“信用终极背书”，完全是西方金融统治阶级为了开展金融剥削而长期编造的谎言。也正是这个谎言，使美国的庞大黄金储备成为维系美元霸权的核心工具。其逻辑链条是：“美国黄金最多→美元最可信→美元天然是世界货币”。这一逻辑来自欧洲金本位的基因遗传，也是美元霸权的脊梁。其中，黄金的“重要性”是美元霸权的命门。

美元霸权从财力上支撑起了美军霸权，再进一步支撑起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霸权。然后它们相互赋能，共同支撑起了美国唯我独尊的全面霸权主义。这完全是近代史上欧洲殖民扩张思维的现代翻版。其中，美元霸权是核心。正是这一霸权行为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债务高企、生育衰退、秩序动荡与冲突频发等现代文明困境，已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最大桎梏。

以上表明，美元霸权全方位继承了欧洲金融资本的衣钵，其原始积累和剥削机制来自 16-19 世纪欧洲金融资本对中国的长期铸币税剥削，根植在中华民族近代三百年悲惨苦难史中。

三、历史规律：被掩盖的文明兴衰法则

基于对以上历史真相的深入剖析，本文得到了“**货币垄断制度导致文明兴衰**”的根本法则。只因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于西方金融统治阶级的精心筛选、资助、固化和不断推广，刻意将货币发行粉饰为“中性”的金融活动，使这一关乎人类文明存续的根本历史规律，在“资本增殖至上”的话语霸权下不为人知。

（一）货币垄断制度导致“货币分配失衡”，是中国古代王朝周期律的根源

本文构建的中国古代“王朝周期律理论模型”揭示，王权货币垄断制度存在“剥削生育劳动价值本源，导致货币分配失衡”的根本缺陷，叠加王朝中晚期高利贷失控的强制催化，导致王朝必然走向衰落；但该制度具有强大的内生修复机制，能让社会产生革命的强烈渴望和强大力量，进而推动了王朝更替；新朝建立后启动修复机制、实现经济复苏，如此周而复始。

王权货币垄断制度的根本缺陷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大量货币在发行环节被通过贪污截留、高薪俸禄、利润分配等多种途径直接进入少数人手里，转化为高利贷的原始资本，导致“**货币集中**”；另一方面家庭部门缺钱消费，造成需求端的消费不足与供给端的劳动力失业，这种长期并存的“**供需断裂**”，本质是没有钱来做交换媒介，使供给与需求双方长期分裂性地存在，连接不上。

中国古代王权向来重视严打高利贷，然而高利贷因能短期暴利，实际屡禁不止。在王朝中晚期，以“印子钱”为代表的高利贷追求“钱生钱”的金融资本无限增殖，逐步使社会陷入赤贫困境，导致生产与消费的“共同湮灭”。其内在机制可概括为：

“货币垄断→分配失衡→直接流向少数人→转化为高利贷金融资本→钱生钱剥削→金融资本无限增殖→民间货币逐步清零→赤贫困境→产消湮灭”。这造成王朝中晚期严重“钱荒”、社会消费力逐步枯竭和经济大萧条，导致王朝覆灭。

在王朝更替过程中，谁能把“天下为公”的口号喊得越响亮和落到实处，谁就能汇聚人心、凝聚强大的革命力量，成为新的王者。

新朝建立后将兑现“天下为公”的革命承诺：通过没收旧官僚和高利贷资本窖藏的金属货币，以及掌控新货币发行权，拥有强大的财力，用于重启经济，例如兴修水利和搞轻徭薄赋，实现经济复苏与国力提升。这是王朝更替的“内生修复机制”，可表述为：“盘活存量货币+注入增量货币+休养生息”组合。然后王朝到了中晚期，又掉入高利贷陷阱，开启新的轮回。

由此，中国古代的王朝周期律可概括为两条历史规律：（1）经济规律：“货币垄断→生育困难→高利贷失控→民生凋敝→文明衰退→动荡战乱→王朝更替”；（2）社会规律：“经济重建（休养生息→支持生育）→分配失衡→动荡战乱→推倒重来”。

然而 16-19 世纪，欧洲金融资本在中国构建起白银货币垄断制度，夺取中国货币发行权、窃取中国铸币税，使明清两代即使实现了王朝更替，也无法通过“休养生息”重启经济，滑向了严重衰落的深渊。由此，形成了一条新的历史规律：“铸币税失窃（物质资本外流）→无法休养生息→生育困难→人力资本枯竭→国运衰竭”。

（二）中西方发展分野的根本原因在于铸币税失窃导致人力资本此消彼长

欧洲金融资本通过掠夺中国铸币税，不仅完成了原始积累，还支撑起教育与科研，推动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跨越式提升，形成“人才培养→技术突破→经济增长”的正向循环，推动了工业革命；中国则因铸币税长期流失而人力资本枯竭，导致发展停滞于传统农业文明。欧洲金融资本还把掠夺铸币税的剥削逻辑推广至全球，使非西方世界普遍陷入货币主权旁落、人力资本衰竭的困境，最终形成“西方主导、非西方依附”的全球发展格局。

由此，本文对四大经典学术议题作出统一回答：（1）李约瑟之谜：人力资本枯竭使中国明清两代工业革命的三大基础（物质资本、市场基础、人才支撑）全部丧失；（2）近代大分流：人力资本的“此消彼长”造成中西方发展分野；（3）全球经济中心转移之谜：铸币税主导权带动人力资本一起转移，驱动了全球经济中心的变迁；（4）非西方世界现代化困境：铸币税长期流失导致人力资本衰竭，成为无法跨越的历史障碍。

基于以上答案，本文形成核心论断：人力资本是国家第一资本。并得到“人力资本定律”：一国长期发展的上限与下限，最终取决于其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而铸币税的归属，是决定人力资本兴衰的根本制度变量。

四、制度创新：用货币发行制度改革照亮文明新路

本文在揭示历史真相与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被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遮蔽的文明新路：通过货币发行制度改革，建立以生育劳动为锚定、以人力资本培育为核心的“生育铸币制度”；其实质是“生育劳动铸造货币”。这一创新制度，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体现，是对中国古代“天下为公”思想的创造性继承，更是破解全球生育衰退与美元霸权双重困境的根本出路。

（一）用“生育铸币制度”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国家采取生育补助的唯一方式，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就是建立起了生育铸币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目标是让铸币税直达育儿家庭，用于人的再生产，以此恢复正常的生育率、补齐消费短板和推动充分就业，形成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的稳定锚。该制度既能打破货币分配失衡、打通国内大循环和摆脱美元锚定，更能为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本文对生育铸币制度提出了五条总体构想。这一改革将释放出过去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所累积和隐藏的庞大铸币税红利，可用于一举清偿各级政府的历史债务；还会有大量剩余，可用于建立“全民普惠型养老基金”，优先用于支付退休农民工的养老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全民普惠型养老金制度”，以此扩大国内消费、支持起青年人的就业和婚育。这一改革的终极目标是：（1）实现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2）激活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建成真正的发达国家。

本文对生育铸币制度做了可行性验证，表明生育铸币制度改革简单可行，完全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全面化解当前通货紧缩和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的严峻问题；并且国家可以主动、有计划地推进改革，不会对经济和金融秩序造成任何冲击，更不会带来通货膨胀。

生育铸币制度将重构经济循环，核心链条是：“生育劳动（发行货币）→人口繁衍（消费需求）→劳动力商品（充分就业）→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产销两旺）→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反哺生育劳动（幸福生活）”。这一改革将带来八个方面的重大成果，能为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底层制度支撑。受限于篇幅，不再赘述，详见第九章原文。

我国具有率先建立生育铸币制度的独特优势：政治独立与制度自信、雄厚物质与科技基础、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与强大国防后盾，还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二）中美竞争的核心与本质，是货币制度的终极较量

货币发行制度是国家资源配置、财富分配的核心底层架构，也是大国博弈的根本主战场。目前中美竞争的表层博弈体现在贸易、科技、地缘政治等多维领域，但究其

核心与本质，是货币制度的终极较量。

现在美元霸权拥有七大优势：（1）充当各国储备货币（外汇储备），这是根基优势；（2）畸形人口发展优势，这是长期支撑；（3）持续数百年累积的剥削技术“核心算法”，这是能力优势；（4）黄金储备全球第一，并且遥遥领先，这是资本优势；（5）掌控两大国际金融机构，这是权力优势；（6）军事霸权，这是暴力优势；（7）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这是话语优势。这些优势使美元霸权成为一道外壳坚硬、很难打破的铁枷锁，牢牢地套在了人类身上，已成为现代文明困境的核心乱源。

再往前追溯，从16世纪至今五百年，全球经济始终笼罩在西方金融统治阶级掠夺铸币税的旧秩序之下，从未改变。

我国率先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就完全离开了美元霸权所主导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赛道，将达到釜底抽薪、建立新秩序的效果。其实质是与美元霸权展开差异化的“货币制度竞争”，将引领人类文明新方向，团结世界人民一道，以换道超车的方式，逐步瓦解美元霸权。

（三）瓦解美元霸权的第一战：以“人本位”取代“金本位”和“美元本位”

本文提出，国家建立“储备黄金交易市场”，把央行持有的黄金储备以“纸黄金”形式逐步卖出，变现所得全部划转至国家社保部，专项用于生育补助，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储备黄金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实物，使用权归国家。这一改革兼具民生价值与战略意义，核心是推动黄金从“货币锚”回归“投资品”。

如此改革后，货币将全面脱离黄金锚定，转而以“人的再生产”为根本锚定，使国与国之间不再比拼黄金数量。这将使美国官方金库和华尔街金融资本私库里的天量黄金从“霸权支柱”蜕变为“普通资产”，彻底击碎“美国黄金最多→美元最可信→美元天然是世界货币”的底层逻辑，打断美元霸权的脊梁。这实际是用“人本位”取代“金本位”和“美元本位”，是瓦解美元霸权的第一战。

（四）用生育铸币制度瓦解美元霸权，引领人类文明新方向

生育铸币制度的建立，不仅是中国自身的制度革新，更能成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核心旗帜，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公平、普惠、共生的方向变革。

用这一制度瓦解美元霸权，核心并非直接的金融对抗，而是通过跳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框架、重构货币发行底层逻辑、重塑国内经济循环，从根源上抽离美元霸权的存续基础，以制度创新实现换道超车，推动美元霸权从“全球货币”逐步走向“美国货币”，最终实现霸权的系统性瓦解。

人类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霸权的终结，从来不是被武力打倒的，而是被更好的制度淘汰的。美元霸权的终结，未必是某天突然崩盘，而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推行生育铸币制度后，逐渐自行缓慢瓦解。这是文明之战，不是热战。

人类社会由无数个家庭组成，生育铸币制度的核心逻辑是货币发行锚定生育劳动、发展成果惠及育儿家庭，这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此，人类社会将告别“资本奴役人民”的旧时代，迈入以生育为基石、以人民幸福为目标、以共生共荣为方向的“生育文明”新纪元，最终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

五、历史总纲（核心结论）：货币制度决定文明兴衰

基于构建“国家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需要，本文提出“历史总纲”结论。所谓历史总纲，是指贯穿人类文明史（国家出现以后的人类历史）全过程，统摄一切国家兴衰与经济变迁的**根本历史规律**。纵观古今中外历史，统领王朝更迭与文明起落全过程的历史总纲可概括为：货币制度决定文明兴衰。

文明存续与发展，根基在于人的再生产与人力资本积累；而这一历史进程从根本上受制于货币发行与铸币税分配制度。货币制度是决定社会价值分配、支撑人的再生产、主导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经济循环通畅的国家底层制度安排，是文明兴衰与国家沉浮的关键变量。货币发行权归属、铸币税分配结构，从根本上塑造了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文明走向与长期命运。

人类自奴隶社会以来，长期通行货币垄断制度。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王权货币垄断制度、明清时期欧洲金融资本主导的白银货币垄断制度，还是美元霸权推向全球的现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本质都是货币发行权被单一主体垄断、铸币税收益脱离生育劳动价值本源、向少数群体或部门集中的排他性制度。在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长期绕开家庭部门生育劳动，使家庭部门没有足够的货币消费，造成社会大众消费能力不足、社会内卷、生育支撑缺失，使经济循环持续梗阻、人力资本积累受损，最终导致国家陷入周期性发展困境与文明衰退。古代王朝周期更迭、近代东西方大分流、全球现代文明困境，本质上都是货币垄断制度长期运行的必然结果。历史反复证明：货币垄断制度必然导致文明衰退。

与之根本不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生育劳动为价值本源、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的生育铸币制度，将货币发行锚定在人的再生产这一文明根基之上，能够从源头修复分配失衡、提振生育意愿、补齐消费短板、夯实人力资本，为国家长期繁荣与文明持续发展提供稳定支撑。因此以生育劳动为根本的货币制度将支撑文明兴盛。

综合上述，货币制度是决定文明兴衰的关键变量；货币垄断制度是导致古今中外文明困境与兴衰更替的深层制度根源。人类社会要走出债务高企、生育衰退、分配失衡、冲突加剧的现代文明困局，实现持久和平与永续发展，必须从货币制度这一根本处破题，推动货币体系从垄断剥削形态转向以人民为中心、以生育劳动为价值本源的新形态。

六、研究展望

本文是“国家经济学”系列研究的开篇（历史理论），以中国明清三百年白银铸币税流失为历史铁证，提出和论证“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和“货币制度决定文明兴衰”核心命题。这是“生育劳动铸造货币”的理论研究起点，也为后续研究奠定历史理论基础。

后续研究将围绕以下方向展开：构建以“**货币本质是劳动力**”为**元命题**的原创货币理论体系，阐明用生育铸币制度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具体机制；探索以家庭部门生育劳动为基础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规律等等。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以人的再生产的价值创造为核心、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标的“国家经济学”理论体系。

同时，建议学界以“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为理论起点，围绕“货币制度决定文明兴衰”核心命题，展开深入研究，以此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边界，筑牢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 人口研究, 2004(2): 2—9.
- [2]樊树志. 晚明大变局[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3]弗里德曼, 施瓦茨. (1963). 美国货币史[M]. 巴曙松,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4]贡德·弗兰克. (1998). 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 刘北成,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 [5]李约瑟. (1954). 中国科学技术史[M]. 卢嘉锡等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6]刘志伟. 白银与明清国家财政[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 65—78.
- [7]麦迪森. (2001). 世界经济千年史[M]. 伍晓鹰,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8]马尔萨斯. (1798). 人口原理[M]. 朱泱,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9]米什金. (2016). 货币金融学[M]. 郑艳文,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 [10]麦金农. (1973).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 卢骢,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8.
- [11]彭慕兰. (2000). 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 史建云,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12]全汉昇. 明清经济史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3]托马斯·库恩. (1962).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 胡新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14]特里芬. (1960). 黄金与美元危机: 自由兑换的未来[M]. 陈尚霖, 雷达,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5]万明. 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全球贸易[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2): 178—190.

- [16]王信. 美元霸权的演变与中国的应对[J]. 国际经济评论, 2022(3): 9—25.
- [17]王丰, 蔡泳. 中国的低生育率与人口可持续发展[J]. 人口研究, 2020(1): 3—17.
- [18]向松祚. 美元霸权[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7.
- [19]肖. (1973).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 邵伏军, 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8.
- [20]亚当·斯密. (1776). 国富论[M]. 富强,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183—188.
- [21]杨瑞龙. 迈向更加自主的经济学研究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 2026(4): 31-44.
- [22]张明. 全球美元循环与中国的对策[J]. 国际经济评论, 2021(5): 34—48.